

堂子與清朝的國家祀典*

葉高樹^{†**}

清朝的堂子祭祀，源自女真族的薩滿信仰，隨著政權的發展，儀式日漸繁複，並與承繼自明朝的典禮相結合，成為國家祀典的一部分。一般認為《滿洲祭神祭天典禮》是屬於清朝皇室薩滿信仰的祭祀書，現有的研究也多將堂子祭祀歸入宮廷活動；事實上，無論是每年以元旦為起始的定期祭祀，或是因出征、凱旋所舉行的軍事典禮，都與國家的禮儀制度緊密結合。雖然清朝皇帝一再強調，堂子祭祀是滿洲的傳統，實際上卻是禮儀制度建構的過程。因此，本文以堂子為中心，就其祭祀儀式的變化，及其與漢式儀式的對接，分析堂子成為國家祀典體系一環的歷程，以呈現清朝政治文化的特色。

關鍵詞：堂子、薩滿信仰、滿洲傳統、《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 本文獲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NSTC-110-2410-H-003-007)補助，謹申謝忱，並感謝兩位審查人指正。

** 服務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通訊地址：106 臺北市和平東路二段 162 號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電話：02-77341528 0935747487
Email：t23003@ntnu.edu.tw

一、前言

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元旦清晨，光緒皇帝(載湉，清德宗，1871-1908，1875-1908 在位)遵循傳統，先赴紫禁城內廷東側奉先殿行禮，接著前往東安門南河沿的堂子行禮，並遣官至天安門東側祭太廟後殿，再率王、大臣等詣皇極殿慶賀慈禧皇太后(葉赫納喇氏，1835-1908)，始御太和殿接受群臣朝賀，¹這是清朝皇帝最後一次元旦在堂子行禮。奉先殿和太廟原係明朝皇帝安放祖宗神主牌位、祭祀祖先之處，²清朝承其祭祀之制；至於元旦在堂子舉行儀式，就《滿文原檔》所見最早的記錄是天命七年(1622)。是日，努爾哈齊(清太祖，1559-1626，1616-1626 在位)率八旗諸貝勒、大臣出城，在堂子叩頭。³

「堂子」一詞，係滿文的音譯，轉寫羅馬拼音作「*tangse*」，是女真部落祭祀的場所，源自北亞民族自然界多神崇拜的薩滿信仰。南宋徐夢莘(1126-1207)《三朝北盟會編》記載，「珊蠻者，女真語巫嫗，以其變通如神」。⁴「珊蠻」即「薩滿」，滿語讀如「*saman*」，清朝官方譯為「祝神人」或「司祝」，是向神祇乞求、禱祝之人；⁵擔任者以女性居多，若為宮廷薩滿，則另稱「贊

¹ (清)世續等修，《清實錄·德宗景皇帝實錄(八)》(北京：中華書局，1987)卷 586，「光緒三十四年正月丁亥」條，頁 737。

² 太廟為帝王祖廟，由來已久，明初定四時孟月(正月、四月、七月、十月)和除夕，凡五享，其後祭期屢有調整。清嘉慶二十四年(1545)，定「孟春仍於上旬擇日，孟夏、孟秋、孟冬仍用朔日，俱合享，祫祭仍以歲除日」。奉先殿初建於洪武三年(1370)，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1368-1398 在位)以「太廟時享，未足展孝思，始於乾清宮別建奉先殿，朝夕焚香，朔望瞻拜，時節獻新，生忌致祭，用常饌，行家人禮。永樂(1403-1424)定都，建宮殿如南京」。分見(明)申時行等修，《明會典》(北京：中華書局，萬曆朝重修本，1989)卷 86，〈禮部·廟祀〉，頁 497；(明)申時行等修，《明會典》，卷 89，〈禮部·廟祀·奉先殿〉，頁 503。

³ 馮明珠主編，《滿文原檔》(臺北：沉香亭企業社，2006)第 2 冊，〈張字檔〉，頁 336。

⁴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 3，〈政宣上帙三〉，頁 12a。

⁵ (清)傅恆等奉敕撰，《御製增訂清文鑑》，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第 232-233 冊，卷 10，〈人部·人類·祝神人〉，頁 13a。漢文《滿洲祭神祭天典禮》將「*saman*」譯為「司祝」，見(清)允祿等奉敕撰，阿桂、于敏中等譯漢，《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第 657 冊，卷 1，〈祭神祭天議〉，頁 1b。

祀女官」。⁶她們在「跳神」(*samdambi*)的儀式中，受到自我暗示或某種刺激後，將神靈引進自己的軀體，或進入魂靈出竅狀態，從而產生超自然力量，並透過占卜、祭祀、禱祝等方式，達到驅崇治病、過陰追魂、禳災祈福的目的。⁷在此過程中，形成先由口傳再轉為文字記錄的「神諭」(*weceku ulabun*，漢語稱為「神本子」)，最初存放在各自家中西炕上方放「神匣」處，其後各部落在居住聚落內建立存放神諭的固定場所，即所謂的「堂子」。⁸

努爾哈齊在赫圖阿拉(*hetu ala*，興京，癸卯年〔1603〕建)、遼陽(東京，天命六年〔1621〕建)、瀋陽(盛京，天命十年〔1625〕建)的都城，皆設有堂子。⁹皇太極(1592-1643，1627-1643 在位)繼位後，前往祭祀的次數增多，並於崇德元年(1636)諭定祭堂子、神位典禮，禁止民間私設；¹⁰在盛京城東內治門外的堂子祭祀，¹¹遂為愛新覺羅家族專有。順治元年(1644)，清軍入關，也在北京城玉河橋東(東安門外、翰林院東)建堂子。(參見圖 1)惟前述光緒皇帝往祭的堂子，是光緒二十七年(1901)另覓地點新建的，係因義和團事件與八國聯軍之役(光緒二十六年〔1900〕)破壞北京城外國使館區，戰後義大利選定堂子

⁶ (清)允禔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則例》，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第 620-625 冊，卷 161，〈內務府·掌儀司·大內祭神〉，頁 47b-48a。

⁷ 參見莊吉發，《薩滿信仰的歷史考察》(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6)，頁 40-42。「跳神」(*samdambi*)是指巫人戴神帽、束腰鈴，扭腰搖擺地邊打神鼓邊走的狀態。見(清)傅恆等奉敕撰，《御製增訂清文鑑》，卷 6，〈禮部·祭祀類·跳神〉，頁 46b。

⁸ 參見富育光、孟慧英，《滿族薩滿教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頁 147-149。

⁹ 參見白洪希，〈清宮堂子祭探蹟〉，《滿族研究》，1995 年第 3 期(瀋陽，1995.08)，頁 61-62。

¹⁰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註，《滿文老檔》(北京：中華書局，1990)，〈奉命制定堂子神位典禮〉，「崇德元年六月十八日」，頁 1514。

¹¹ (清)阿桂等奉敕撰，《欽定盛京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第 501-503 冊，卷 19，〈壇廟·堂子祀典〉，頁 8a。惟《皇朝文獻通考》、《皇朝通典》皆言：「堂子在盛京撫順門外」，而「撫順門」應為「撫近門」之誤。分見(清)嵇璜等奉敕撰，《欽定皇朝文獻通考》，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第 632-638 冊，卷 99，〈郊社考·堂子〉，頁 1b；(清)嵇璜等奉敕撰，《欽定皇朝通典》，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第 642-643 冊，卷 43，〈禮·大內祀神〉，頁 25a-25b。

原址作為使館用地。清廷原欲以海關公所地交換，幾經交涉無效，光緒皇帝遂指示擇地重建，¹²命工部尚書張百熙(1847-1907)會同禮部祠祭司、內務府掌儀司等照式勘丈、繪圖，¹³並購回洋人拆卸的堂子正殿三楹木料、琉璃石片等物。¹⁴

滿洲自努爾哈齊建國以來，「凡每歲元旦及月朔，國有大事，則為祈為報，皆恭詣堂子行禮。大出入必告，出征、凱旋則列蠹而告，典至重」，¹⁵被認為是保存舊俗的具體表現。¹⁶自皇太極時代開始，雖將薩滿信仰導入漢式的皇帝儀式中，卻未放棄滿洲傳統祭祀，也未促使兩者融合，以達到保持民族特質與統治中華世界的現實需要。¹⁷薩滿信仰原本就有多神崇拜的特

¹² 〈辛丑議約·擴充使館界址·奉旨堂子擇地重建毋庸以海關公所地抵換由〉，「光緒二十七年三月二十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檔案》，館藏號：01-14-016-01-025。

¹³ 〈奕劻等·奏請簡大員承修堂子〉，「光緒二十七年七月初七日，硃批」，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代檔案檢索系統》，統一編號：故機 143732。

¹⁴ 〈張百熙等·函呈購回洋人所拆堂子木料情形〉，「光緒朝」，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代檔案檢索系統》，統一編號：故機 143745。

¹⁵ (清)嵇璜等奉敕撰，《欽定皇朝文獻通考》，卷 99，〈郊社考·堂子〉，頁 1a-1b。

¹⁶ 參見鄭天挺，〈滿洲入關前後幾種禮俗之變遷〉，收入鄭天挺，《清史探微》(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頁 36-40。相關討論甚多，例如：陶立璠認為，堂子祭祀有保持滿洲民族特質和維持文化認同的作用，見陶立璠，〈清代宮廷的薩滿祭祀〉，《西北民族研究》，1992 年第 1 期(蘭州，1992.02)，頁 221-232；白洪希則指出，堂子祭祀在清前期具有維護國家統治的作用，中期視之為傳統習俗而保留，後期則漸失其原有地位，見白洪希，〈清宮堂子祭祀研究〉，《民族研究》，1996 年第 4 期(北京，1996.07)，頁 78-83。

¹⁷ 參見楠木賢道，〈清太宗皇太極的太廟儀式和堂子——關於滿漢兩種儀式的共處情況〉，《清史研究》，2011 年第 1 期(北京，2011.02)，頁 128-129。關於引進漢族儀式進入薩滿信仰，另有認為皇太極的目的在控制民間祭祀，結果造成薩滿神職功能萎縮的看法，參見姜小莉，〈清入關前滿族薩滿教變革論析〉，《黑龍江民族叢刊》，2008 年第 2 期(哈爾濱，2008.03)，頁 107-111。又有學者主張是藉由漢文化或儒家文化以鞏固統治，或是一種「漢化」的表現，分見閻崇年，〈清代宮廷與薩滿文化〉，《故宮博物院院刊》，1993 年第 3 期(北京，1993.07)，頁 55-64；杜家驥，〈從清代的宮中祭祀和堂子祭祀看薩滿教〉，《清史研究》，1990 年第 1 期(北京，1990.02)，頁 45-49。

色，出現其他信仰文化的成分並不意外，¹⁸祭祀儀式也從原本的簡單質樸朝向繁文縟節發展；乾隆十二年(1747)，乾隆皇帝(弘曆，清高宗，1711-1799，1736-1795 在位)宣布編纂《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用意時，卻強調是恢復「舊制」。¹⁹孟森(1868-1938)認為堂子為祭天而設之說，係乾隆皇帝「文飾之語」，而為臣工依循，²⁰惟《滿文原檔》顯示是出自皇太極指授。²¹

清朝將部落祭堂子的活動儀式化，並與其他典禮整合成國家祀典，論者多著眼於滿、漢的文化互動。²²本文擬以制度史的視角，透過制度與制度

¹⁸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曰：「(滿洲)各姓祭祀，皆隨土俗，微有差異，大端亦不甚相遠。……凡朝祭之神，皆係恭祀佛(*šig'amuni fucuhi*，釋迦牟尼佛)、菩薩(*jilan i bulekušere fusa*，觀世音菩薩)、關帝(*guwan i beise*〔關貝子〕，或做 *guwan mafa*〔關老爺〕)，惟夕祭之神，則各姓微有不同」。見(清)允祿等奉敕撰，阿桂、于敏中等譯漢，《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卷1，〈彙記滿洲祭祀故事〉，頁6a-6b

¹⁹ 參見(清)允祿等奉敕撰，阿桂、于敏中等譯漢，《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卷首，〈上諭〉，「乾隆十二年七月初九日，奉上諭」，頁1a-2a。關於《滿洲祭神祭天典禮》的敕編過程與史料價值的討論，參見葉高樹，〈《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編譯、版本及其史料價值〉，收入葉高樹，《滿文《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譯註》(臺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2018)，頁15-38。

²⁰ 參見孟森，〈清代堂子所祀鄧將軍考〉，收入孟森，《明清史論著集刊》(北京：中華書局，1959)，頁312。

²¹ 《滿文原檔》載：「*han i hese*,(汗諭)*tangse wecere enduri wecere be toktobuha*,(定祭堂子、祭神).....*julgei amba kooli be alhūdame*(仿照昔日大典)*abka de weceme deribuhe*,(開始祭天)*te gūnici abka serengge dergi amba ejen*,(今思天者上帝)*abka wecere, enduri wecerengge inu encu akū*(祭天、祭神者也沒有差別)」。見馮明珠主編，《滿文原檔》，第10冊，〈日字檔〉，頁281。關於這段記事，《滿文原檔》及其重抄本《滿文老檔》的內容一致，見滿文老檔研究會譯註，《滿文老檔VI·太宗3》(東京：東洋文庫，1962)，頁1139。孟森是根據官書提出質疑，當時《滿文原檔》尚未公開，其重抄本《滿文老檔》的研究才剛起步，因受資料限制，所以會認為堂子祭天的說法是乾隆朝所增飾。

²² 例如：姜小莉，〈薩滿教與清代國家祭祀〉，《社會科學戰線》，2019年第3期(長春，2019.03)，頁131-139；吳恩榮〈國家禮制視域下的清代滿洲祭禮之源起與流變〉，《清史研究》，2019年第3期(北京，2019.08)，頁66-76。姜小莉以量化的方法，論證薩滿信仰的元旦堂子拜天與漢制冬至圓丘祀天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以及統治者對堂子在軍禮中地位的重視態度，並認為兩者皆能體現清朝秉持開放的心態實現滿、漢文化交融。吳恩榮則就祭禮中的滿、漢儀式消長，指出清朝統治者設法將滿洲祭禮融入漢族的吉禮體系，但滿洲祭禮根植於民俗與信仰，難與屬於帝制的漢族祭儀相容，只能藉由「漢化」來文飾或在理論上依附漢禮，以避免被邊緣化。滿洲祭禮與漢制是否「交融」或「設法融入」，見仁見智，但《滿洲源流考》指出，本朝祭祀詳載於《滿洲祭神祭天典禮》、《皇朝禮器圖式》、《大清通禮》；《四

間的互動，以及釐清制度與非制度因素的關係，²³從堂子祭祀制度的建立切入，分別討論具有連結皇室與外朝意義的歲時祭儀，以及整合八旗與國家作用的戰爭祭祀。

二、堂子規制與祭器

據《世祖實錄》載，堂子由享殿、八角亭、收貯舊饗神房、殿門、祭神八角亭、大門、圍牆外神廚等幾幢建物共同構成，並分別註明其間數和寬、長、高尺寸。²⁴各建物的座落方位，據乾隆朝《大清會典》為：街門北向，內門西向；祭神殿居正中南向，前為拜天園殿，殿南正中設大內致祭立杆石座，次稍後兩翼分設，各六行，行各六重，第一重為諸皇子致祭立杆石座，次親王、郡王、貝勒、固山貝子、公，各依爵秩次序排列，均北向；東南建上神殿，南向。²⁵《實錄》、《會典》的建物漢文名稱不一致，和滿、漢文《欽定

庫全書總目》亦言，奉旨將滿文本《滿洲祭神祭天典禮》依文音釋譯，與《大清通禮》相輔而行，可見在堂子祭祀定制的乾隆朝，是採取「並存」的處理原則。分見(清)阿桂、于敏中等奉敕撰，《欽定滿洲源流考》，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第499冊，卷16，〈國俗·序〉，頁3b-4a；(清)紀昀、陸錫熊、孫士毅等奉敕撰，《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第1-5冊，卷82，〈史部·典禮·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頁26b。至於吳文認為《滿洲祭神祭天典禮》的書寫已經較為「漢化」，而《滿洲跳神還願典例》更接近祭禮原貌，係引述劉厚生「用漢文化的宗教觀和模式去塑造一個新的薩滿教」之說。《滿洲跳神還願典例》一書，是覺羅普年(1792-?)在道光八年(1828)就滿文《滿洲祭神祭天典禮》摘要翻譯編成，惟劉厚生另文指出，是較漢譯本《滿洲祭神祭天典禮》忠於滿文原文，故問題不在《典例》保留滿洲祭禮原貌，而在《典禮》譯漢時過多修飾。分見劉厚生，〈一部鮮為人知的薩滿教典籍——《滿洲跳還願典例》評介〉，收入閻崇年編，《滿學研究·第一輯》(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頁173；劉厚生、陳思玲，〈《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評析〉，《清史研究》，1994年第1期(北京，1994.02)，頁66。

²³ 有關制度史的研究方法，參見鄧小南，〈走向「活」的制度史——以宋代官僚政治制度為例的點滴思考〉，《浙江學刊》，2003年第3期(杭州，2003.03)，頁99-103。

²⁴ (清)鄂爾泰等修，《清實錄·世祖章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8，「順治元年九月己亥」條，頁7a-8b。

²⁵ (清)允禩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乾隆朝)》，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第619冊，卷88，〈內務府·掌儀司〉，頁16b-17a。八旗分兩翼：左翼為鑲黃、正白、鑲白、正藍；右翼為正黃、正紅、鑲紅、鑲藍，

滿洲祭神祭天典禮》亦有不同。茲就《世祖實錄》列舉的建物名稱，與《大清會典》、《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對照如下：

表 1：官書所見堂子建物名稱對照表

《世祖實錄》／《大清會典》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備註
享殿／祭神殿 <i>wecere diyan</i>	饗殿 <i>wecere diyan</i>	3 間，有闌廊(<i>šurdeme nanggin</i> ，圍廊)，闊(寬)5.35 丈、深(長)3.3 丈、簷柱(高)1.26 丈
八角亭／拜天圜殿 <i>ordo emke, jakūn hošo</i>	亭式殿 <i>ordo</i>	1 座，圍(周長)2.65 丈、簷柱 1.07 丈
收貯舊饗神房 <i>halaha weceku sindara boo</i>	收貯所掛神幡紙錢室 <i>lakiyaha girdan hoošan jiha be asarara boo</i>	2 間，闊 1.7 丈、深 1.55 丈、簷柱 1 丈
殿門 <i>duka</i>	門 <i>duka</i>	1 間，闊 1.35 丈、深 1.5 丈、簷柱 1.12 丈
祭神八角亭／上神殿 <i>enduri be wecere ordo emke, jakūn hošo</i>	尚錫神亭 <i>šangsi enduri ordo</i>	1 座，周長 2.2 丈、高 0.94 丈
大門 <i>amba duka</i>	門 <i>duka</i>	3 間，闊 4 丈、深 2 丈、簷柱 1.08 丈
神廚房 <i>amsun i boo</i>	神廚 <i>amsun i boo</i>	圍牆外，3 間，闊 3.5 丈、深 2 丈、簷柱 1 丈
——／立杆石座	立神杆之石 <i>siltan moo ilibure wehe</i>	

凡行軍、佈陣、紮營、排班，皆依序排列。見(清)鄂爾泰等修，《八旗通志·初集》(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85)卷 2，〈旗分志·八旗方位〉，頁 17。

資料來源：(清)鄂爾泰等修，《清實錄·世祖章皇帝實錄》，卷 8，頁 7a-8b；(清)鄂爾泰等修，《*daicing gurun i šidzu eldembuhe hūwangdi i yargiyan kooli*(大清世祖章皇帝實錄)》，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卷 8，頁 19b-20b，統一編號：故宮 012640；(清)允禩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乾隆朝)》，卷 88，頁 16b-17a；(清)允祿等奉敕撰，《*hesei toktobuha manjusai wecere metere kooli bithe*(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東京：東洋文庫藏，清乾隆十二年〔1747〕刻本)第 6 冊，頁 2a-2b；(清)允祿等奉敕撰，阿桂、于敏中等譯漢，《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卷 6，頁 2a-2b。

以「亭」的滿文名稱為例，《實錄》係先修成滿文再譯為漢文，將「*ordo emke, jakūn hošo*」(亭一，八角)譯為「八角亭」、「*enduri be wecere ordo emke, jakūn hošo*」(祭神亭一，八角)譯為「祭神八角亭」，屬於一般名詞；《會典》稱為「拜天圓殿」、「上神殿」，使之帶有神聖、宗教的色彩；《典禮》分別作「*ordo*」、「*šangsi enduri ordo*」，則為專有名詞。滿語「*ordo*」，係蒙古語「*ordu*」借詞，原指「亭子」或「宮中之圓殿」，²⁶是四面無門、窗的建築，也有作成隔扇門者，《御製增訂清文鑑》(乾隆三十六年〔1771〕成書)的釋義作「亭式殿」，並特別強調「*ejen i booi gebu*」(主上的房屋名)，「*irgen i niyalma ere hergen be baitalaci ojarahū*」(民人則不可用此字)；²⁷「*šangsi enduri*」(尚錫神)，則是「堂子內東南亭子內所祭之神」。²⁸滿、漢文《世祖實錄》定本成書於乾隆四年(1739)，所記堂子規模、名稱，當是沿用盛京的規制；《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先於乾隆十二年完成滿文本，再於乾隆四十二年(1777)譯成漢文，其名稱出現變化；乾隆二十九年(1764)成書的《大清會典》加入「天」、「神」的元素，則為漢文名稱調整的過渡階段。

滿、漢文本《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都有「堂子圖」(*tangse i nirugan*)，(參見圖 2、圖 3)可了解其格局；惟圖中未標示出「神廚」(*amsun i boo*)的位置，《實錄》說明是在「圍牆外」(*kūwaran i tule*)，當指圖 2 右邊未標註編號的房屋。

²⁶ (清)沈啟亮輯，《大清全書》(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8)卷 2，「*ordo*」，頁 48b。

²⁷ (清)傅恆等奉敕撰，《御製增訂清文鑑》，卷 20，〈居處部·宮殿類·亭式殿〉，頁 2b。

²⁸ (清)祥亨主編，志寬、培寬編，《清文總彙》(臺北：中國邊疆歷史語文學會，據清光緒二十三年〔1897〕荊州駐防繙譯總學藏板，無出版年)卷 6，「*šangsi enduri*」，頁 35b。

「amsun i boo」可直譯為「祭品的房屋」，《御製增訂清文鑑》寫作「amsun dagilara boo」，²⁹文義相似。薩滿祭神、祭天，供神用的酒(nure，黃酒)、饌(efen，餚餗)皆自製，尤其要求潔淨，是以大內特立「神廚」，一切器用皆專設一分，他處不准使用，王、公、勳舊之家也各有專設；「單姓寒門，並無另室之家，於祭期前，整理祭品後，洗滌鍋、缸，封閉，以備祭祀之用」。³⁰又圍牆外，「松、柏成林，滿人欲請神杆者，具呈禮部，任擇其一，而仍以稚者補之」。³¹

順治年間北京城營建的堂子，在光緒二十七年遭拆除改建為義大利使館，已無實物可供查考。惟從慶親王奕劻(1838-1917)等辦理新建堂子的奏摺可知，「祭神殿三楹、拜天圓殿一座，東南隅尚錫神亭一座，均黃色琉璃瓦、朱色油飾」。³²負責承造的工部尚書張百熙因「選料不易」，乃以銀七千兩向洋人購回堂子原有楠木、黃松製作的樑柱、欂栌、斗科各件，但壇廟神牌已多佚失。³³當時為新建堂子選址也大費周章，由於堂子的方位以東南方向為宜，並須考慮「皇上親詣行禮」的動線，經奕劻等勘得「東安門內迤南河東岸，儘東南隅，地雖稍狹，南、北尚屬寬展，且與禁門臨近」之地，³⁴即長安東街北、北京飯店旁。(參見圖 4)雖然新建的堂子一仍舊式，但受限於周圍環境，面積縮小至原來的五分之一。³⁵

關於盛京堂子的規制，直到嘉慶朝《大清會典》始有記載，包括：正殿(饗殿)三間、迎神亭(亭式殿)一座、神紙庫(以財物獻神祭祀室)一間、庫房三間、

²⁹ (清)傅恆等奉敕撰，《御製增訂清文鑑》，卷 20，〈居處部·壇廟類·神廚〉，頁 7a。「dagilambi」指「預備祭物」，「amsun dagilara boo」的釋義為「預備跳神的牲口、供的肉等物件之處」。

³⁰ (清)允祿等奉敕撰，阿桂、于敏中等譯漢，《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卷 1，〈彙記滿洲祭祀故事〉，頁 14b。

³¹ (清)震鈞，《天咫偶聞》，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臺北：文海出版社，1968)第 22 輯第 219 冊，卷 2，〈城南〉，頁 1b。

³² 〈奕劻等·奏請簡大員承修堂子〉，「光緒二十七年七月初七日」，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代檔案檢索系統》，統一編號：故機 143732。

³³ 〈張百熙等·函呈購回洋人所拆堂子木料情形〉，「光緒朝」，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代檔案檢索系統》，統一編號：故機 143745。

³⁴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摺》(北京：中華書局，1996)第 104 輯，〈工程·工程建築·奕劻摺·附片〉，「光緒二十七年七月初七日」，頁 152。

³⁵ 參見孟森，〈清代堂子所祀鄧將軍考〉，頁 319。

堆撥房三間、門樓三座，圍牆週一百二十八丈六尺，³⁶(參見圖 5)與北京顯有不同。事實上，皇太極時代所建的堂子，早已因滿洲入關而荒蕪。康熙皇帝(玄燁，清聖祖，1654-1722，1662-1722 在位)三次東巡(康熙十年〔1671〕、二十一年〔1682〕、三十七年〔1689〕)，都未在盛京舉行薩滿祭祀；³⁷乾隆皇帝四次東巡(乾隆八年〔1743〕、十九年〔1754〕、四十三年〔1778〕、四十八年〔1783〕)，前三次只在清寧坤祭神，³⁸至第四次擬在盛京堂子行禮，才展開新修工程。³⁹新建堂子告成，盛京禮部也比照京城之例收管，其打掃人役由盛京內務府酌量撥派；每年一切修理、糊飾等項，由盛京工部確查估辦。⁴⁰惟嘉慶二十三年(1818)，嘉慶皇帝(顓琰，清仁宗，1760-1820，1796-1820 在位)東巡堂子祭祀之後，便不再舉行，⁴¹堂子的管理遂漸廢弛。

舉行堂子祭祀時，分別在饗殿、亭式殿、尚錫神亭行禮，三處陳設的供器、器皿不同。(參見圖 6、圖 7、圖 8)茲將各處祭器表列如下：

³⁶ (清)托津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嘉慶朝)》，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臺北：文海出版社，1991)第 64 輯第 631-640 冊，卷 48，〈工部·盛京工部·壇廟之制〉，頁 25b。另據近人調查，瀋陽堂子為東西並列的兩進院，外院有向西的宮門及其他兩座建築，內院之北前為迎神殿，後為大殿，院之東南角又有一中院，內為八方亭。外院東南角有門通往一小院，內有小房一座。堂子內正殿為祭祀主要場所，其東南角院內「尚錫神亭」則以祭天為主。見佟悅，《清代盛京城》(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9)，頁 157。

³⁷ 遼寧省檔案館編，《黑圖檔·乾隆朝》(北京：線裝書局，2015)第 13 冊，〈乾隆八年京行檔·管理盛京內務掌關防佐領實圖等為預備皇上來盛京祭祀時所用各項事呈總管內務府〉，「乾隆八年三月初二日」，頁 15。

³⁸ 參見姜相順，〈清宮薩滿祭祀及其歷史演變〉，《清史研究》，1994 年第 1 期(北京，1994.02)，頁 71-78；白洪希，〈盛京清寧宮薩滿祭祀考辨〉，《故宮博物院院刊》，1997 年第 2 期(北京，1997.05)，頁 31-36。

³⁹ (清)慶桂等奉敕修，《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十五)》(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 1189，「乾隆四十八年九月丙午」條，頁 6b。

⁴⁰ 楊豐陌、趙煥林、佟悅主編，《盛京皇宮和關外三陵檔案》(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3)，〈佐領依博英等為派員會同辦理祭祀堂子安放擺設事呈請轉咨盛京禮部〉，「乾隆四十八年九月十一日」，頁 461。

⁴¹ 嘉慶皇帝於嘉慶十年(1805)、二十三年(1818)兩次東巡，都舉行堂子祭祀；道光九年(1829)，道光皇帝(旻寧，清宣宗，1782-1850，1821-1850 在位)東巡，但未祭堂子，這也是清朝皇帝最後一次東巡。

表 2：堂子內各處祭器一覽表

種類 場所	供器種類與數量	器皿種類與數量
饗殿	鑲紅片金黃緞神幔(1)、銅香碟(3)、安放供金佛亭紅漆座(1)、黃漆大低桌(2)、獻酒楠木低桌(1)、盛器皿黑漆豎櫃(1)、黃紗蠡鐙(4)、掛拍板紅漆木架(2)、盛七里香鑲嵌螺鈿漆匣(1)、盛拜褥紅漆箱(1)、紅紙蠡鐙(32)	供酒銀瓊(3)、供饌銀盤(10)、盛酒大藍花磁碗(2)、盛酒紅花磁缸(2)、浴佛黃磁大浴池(1)、盛酒大黃磁碗(1)、鐵神刀(1)、三絃(1,連布套)、琵琶(1,連布套)、花梨木拍板(10)、涼席(8)、黃緞拜褥(2)、棕毯(18)
亭式殿	銅香爐(1)、楠木高案(1)、案下設掛紙錢杉木柱(1)、黃紗蠡鐙(4)、中間設立神杆石(1)、兩邊設立神杆石(各 1)	供酒銀瓊(3)、供饌銀盤(3)、獻酒楠木低桌(1)、盛酒大藍花磁碗(1)、盛酒暗龍豆綠磁缸(2)
尚錫神亭	銅香爐(1)、楠木高案(1)、案下設掛淨紙杉木柱(1)、獻酒楠木低桌(1)	供酒銀瓊(1)、供饌銀盤(1)、盛酒大藍花磁碗(1)

資料來源：(清)允祿等奉敕撰，阿桂、于敏中等譯漢，《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卷 5，頁 1a-3b；(清)允祿等奉敕撰，阿桂、于敏中等譯漢，《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卷 6，頁 4a-6b。

堂子是皇室薩滿信仰的中心，陳設器用相較於漢式壇廟的形制繁複、作工精細，顯得簡樸；尤其在金屬器方面，材質或銀、或銅，而無金，且品項、數量有限，而奉先殿僅「金爵」一項便多達四十八個。⁴²金屬器中的銅香碟(*teišun i hiyan i fila*)、銅香鑪(*teišun i hiyan dabukū*)，自然是焚香之用。滿文「*hiyan*」的讀音與漢文「香」相近，是指「*enduri weceku i juleri*(神祇前)*dabure wa sain*

⁴² 參見賴惠敏，〈清乾隆皇帝製作金屬祭器的意義〉，《故宮學術季刊》，37 卷 3 期(臺北，2020.09)，頁 49-69。文中討論清宮金屬祭器的製作流程，並就《皇朝禮器圖式》詳細分析各壇廟使用的金屬器品項、數量，可以了解滿、漢傳統祭器的差異。

orho moo(點燃香味的草木)」，⁴³與漢人使用的「炷香」不同，而是用生長在長白山的「七里香」(*ancu hiyan*)製成，⁴⁴「俗呼為達子香，質如二月新蒿，臭味清妙而不濃郁」，⁴⁵以「鑲嵌螺鈿漆匣」(*tahūra notho i kiylmame šugilehe sithen*)裝盛。

配合薩滿行禮使用的樂器，只有三絃(*tenggeri*)、琵琶(*fifan*)、拍板(*carki*)三種，遠不及漢式壇廟有鐘、磬、琴、瑟、簫、笙、鼓等種類繁多。⁴⁶在堂子亭式殿祭祀時，於殿外甬路(*celehe jugūn*，宮殿院內中央的道路)有兩名彈奏三絃、琵琶的太監，以及鳴拍板、拊掌之人，必須按照薩滿持神刀(*halmari*，薩滿法器)跳神、誦唸神歌祝禱的節奏，鳴奏樂器並拊掌；薩滿獻酒時，司俎官(*amsun i janggin*)贊歌「鄂囉囉」(*orolo*)，眾人亦呼「鄂囉囉」。⁴⁷

亭式殿、尚錫神亭都有「楠木高案」(*anahūn moo den dere*)，供香鑪、饌、酒之用，但尺寸不同，亭式殿者所用者，長二尺六寸、寬一尺六寸五分、高三尺八寸；尚錫神亭的較大，長四尺七寸、寬三尺二寸五分、高三尺八寸五分。皇室所用楠木，選自湖南、福建、四川、廣東，⁴⁸不僅「貴重質細」，且採辦、運送耗時費力，⁴⁹是修建宮殿、陵寢必備材料。由於兩種「高案」的高度有差，是以桌下的「杉木柱」(*wantaha moo tura*)大小也不同，前者高二尺九

⁴³ (清)傅恆等奉敕撰，《御製增訂清文鑑》，卷 6，〈禮部·祭祀器用類·香〉，頁 51b。

⁴⁴ (清)傅恆等奉敕撰，《御製增訂清文鑑》，卷 29，〈草部·草類·七里香〉，頁 5a。

⁴⁵ (清)福格，《聽雨叢談》(北京：中華書局，1984)卷 6，〈滿洲祀先不用炷香〉，頁 138。

⁴⁶ 參見(清)允祿等奉敕撰，福隆安等奉敕校勘，《皇朝禮器圖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第 656 冊，卷 8，〈樂器〉，頁 4a-6a、頁 9a-10a、頁 11a-14a。

⁴⁷ (清)允祿等奉敕撰，阿桂、于敏中等譯漢，《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卷 1，〈堂子亭式殿元旦行禮儀注〉，頁 19a-19b。

⁴⁸ (清)允禔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乾隆朝)》，卷 70，〈工部·營繕清吏司·宮殿〉，頁 16b。

⁴⁹ 〈廣東總督今調江南河道總督孔毓珣·奏聞運送楠木及補辦情由事〉，「雍正七年六月二十一日」，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代檔案檢索系統》，統一編號：故宮 022267。

寸、圍徑三寸五分，後者高三尺一寸、圍徑二寸七分。⁵⁰亭式殿的杉木柱上掛的「紙錢」(*hoošan jiha*)，也稱作「淨紙錢」(*bolgo hoošan jiha*)，⁵¹是指「用黃紙鑿成錢象，以代焚帛」；⁵²《御製增訂清文鑑》的解釋則是：「*hoošan be jiha i adali sacifi*(將紙切了像錢一樣)*waliyara sindara de dei jirengge be*(上墳、安葬時焚燒者)」，或指「*giran tucibure de*(在出殯時)*hobo i juleri maktara muheliyen hoošan be*(棺材前拋撒的圓錢)」，⁵³相當於漢人祭祀時用的「金銀紙」或「冥紙」。尚錫神亭掛的「淨紙」(*bolgo hoošan*)，是用完整的高麗紙(*solho hoošan*)，其實也是指「紙錢」。⁵⁴

漢人「鑄紙為錢，以供鬼神」的習俗，約始於唐代(618-907)，⁵⁵滿洲社會祭祀焚燒紙錢，當是仿效漢人習俗。例如：天命八年(1623)，努爾哈齊聽聞有人在清河湯泉出錢焚紙，查知係穆哈連阿哥(*muhalayan age*)「按漢人之例，於廟中焚紙」；⁵⁶天命十年(1625)，努爾哈齊遷都瀋陽，特定前往東京(遼陽)「謁父(塔克世，?-1583)、祖(覺昌安，?-1583)之墓祭掃清明(*hangsi*)，於兩殿殺五牛，

⁵⁰ (清)允祿等奉敕撰，阿桂、于敏中等譯漢，《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卷6，〈亭式殿內楠木高案〉，頁16b；(清)允祿等奉敕撰，阿桂、于敏中等譯漢，《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卷6，〈尚錫神亭內楠木高案〉，頁20b。宮廷所用杉木，來自江南、江西、浙江、湖北，亦多用於建築宮殿、陵寢。見(清)允祿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乾隆朝)》，卷70，〈工部·營繕清吏司·宮殿〉，頁16b。

⁵¹ (清)允祿等奉敕撰，阿桂、于敏中等譯漢，《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卷1，〈堂子亭式殿元旦行禮儀注〉，頁18b。

⁵² (清)福格，《聽雨叢談》，卷6，〈紙錢〉，頁142。

⁵³ (清)傅恆等奉敕撰，《御製增訂清文鑑》，卷6，〈禮部·喪服類·紙錢〉，頁59b-60a。

⁵⁴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曰：「尚錫神亭內，掛淨紙各二十七張，不鑲錢文，用整高麗紙」；滿文的文義較為清楚，曰：「*šangsi enduri ordo i dolo*(尚錫神亭內)*lakiyara bolgo hoošan orin nadata afaha*(掛得淨紙各二十七張)*jiha faitarakū*(錢不裁切)*gulhun solho hoošan baitalambi*(用完整的高麗紙)」。分見(清)允祿等奉敕撰，阿桂、于敏中等譯漢，《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卷5，〈祭神祭天供獻器用數目·供獻物品類〉，頁4b；(清)允祿等奉敕撰，《*hesei toktobuha manjusai wecere metere kooli bithe*(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第5冊，頁5a。

⁵⁵ (清)福格，《聽雨叢談》，卷6，〈紙錢〉，頁142。

⁵⁶ 當時另有努爾哈齊的包衣(*booi*，家人)五、六人也效其所為，均受重懲。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註，《滿文老檔》，〈天命汗命查焚燒紙錢者並將有關人等治以重罪〉，「天命八年二月初七日」，頁409-410。

備紙錢而祭之」。⁵⁷關外時期，紙張多從朝鮮輸入，⁵⁸除書寫之外，主要用於喪葬、墓祭。⁵⁹天聰六年(1632)頒布各官祭葬例，大汗視爵秩高低，恩賜紙四百張至二千張不等；管旗貝勒與不管旗執政貝勒薨，則恩賜紙一萬張。⁶⁰至崇德元年，定每月祭堂子之例，始於神位前「懸掛紙錢」，⁶¹成為薩滿祭祀供獻的項目。其後，另訂：正月初三日、每月初一日、浴佛、祭馬神當日，在亭式殿內掛紙錢二十七張；春、秋二季立杆大祭時，亭式殿內掛黃、綠、白三色高麗紙錢各二十七張；每月初一日，尚錫神亭內掛淨紙各二十七張。⁶²

三、堂子與歲時祭儀

天命七年元旦，努爾哈齊率八旗諸貝勒、大臣等在堂子叩謁後，返回衙門(yamun)；眾臣依序向大汗叩賀新年，即殺牛宰羊，席開百桌，並有各種漢

⁵⁷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註，《滿文老檔》，〈天命汗離東京遷往瀋陽〉，「天命十年三月初三日」，頁 626-627。

⁵⁸ 例如：天命八年(1623)，朝鮮三次遣使前來，其官員攜來進獻的物品中，即包括紙張；天聰六年(1632)皇太極要求朝鮮每年金銀、紡織品、毛皮個若干，以及「大紙千刀(*amba hoošan minggan kyan*)、次紙千刀(*ilhi hoošan minggan kyan*)」等。分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註，《滿文老檔》，〈朝鮮三次遣使前來所攜物品清單〉，「天命八年二月初六日」，頁 409；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註，《滿文老檔》，〈滿洲國天聰汗遣人往朝鮮國定所贈物品額數〉，「天聰六年十一月十七日」，頁 1349。

⁵⁹ 例如：崇德元年，武英郡王阿濟格(1605-1651)征明，攻克昌平等大小十二城，遣官赴福陵(太祖陵)致祭，焚五種紙錢萬餘。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註，《滿文老檔》，〈汗以征明凱旋遣官詣福陵致祭〉，「崇德元年十一月初三日」，頁 1646。

⁶⁰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註，《滿文老檔》，〈頒布諸貝勒大臣各官祭葬例〉，「天聰六年三月十三日」，頁 1255。雖然制定條例，但同年管旗貝勒莽古爾泰(1587-1633)去世，恩賜的紙鏢(*suhe*)，用來焚燒的紙做金、銀元寶)三萬、紙錢五萬。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註，《滿文老檔》，〈初祭莽古爾泰〉，「天聰六年十二月初九日」，頁 1355。

⁶¹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註，《滿文老檔》，〈奉命制定祭堂子神位典禮〉，「崇德元年六月十八日」，頁 1514。

⁶² (清)允祿等奉敕撰，阿桂、于敏中等譯漢，《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卷 5，〈祭神祭天供獻器用數目・供獻物品類〉，頁 4a-4b。

人舞樂，展開慶祝活動。⁶³是年三月，努爾哈齊在宣布「八王共治」體制時，訂定除夕謁堂子、拜神主(*weceku*)的儀式，先由國君(*gurun i ejen*)親自叩拜眾叔、諸兄，然後坐汗位，再與眾叔、兄併坐一列，受國人叩拜。⁶⁴天聰元年(1627)正月初一日，黎明，新君皇太極循例率眾貝勒、大臣詣堂子，與之前不同處，在「對天三跪九叩」(*abka de ilan jergi niyakūrafi uyun jergi hengkilehe*)。⁶⁵滿洲遇事「拜天」並非罕見，此次卻是紀錄上元旦在堂子祭天之始。

天聰十年(1636)年四月，皇太極舉行受尊號禮，稱皇帝，定國號「大清」，建元「崇德」，一切制度多所更張。⁶⁶五月，定元旦朝賀禮：

鳴亮鐘時，自和碩親王、多羅郡王、多羅貝勒以下，眾護軍以上，列於大政殿。聖汗出，率諸和碩親王、多羅郡王、多羅貝勒、固山貝子及首輔大臣等詣堂子。拜天，行三跪九叩頭禮。聖汗自還清寧宮，諸和碩親王、多羅郡王、多羅貝勒及大臣等，復列於大政殿。俟聖汗出，御寶座畢，首由諸和碩親王、多羅郡王、多羅貝勒、固山貝子、公等，行三跪九叩頭禮，次固山額真等各率本旗行三跪九叩頭禮。兩側分立滿、蒙、漢贊禮者各一，共六員，贊跪、贊叩。⁶⁷

大政殿(*amba dasan i yamun*)原稱「八角殿」(*jakūn hošonggo ordo*)、「大衙門」(*amba yamun*)，是君臣集會議政、朝賀筵宴之處，清寧宮(*genggiyen elhe boo*)則是皇太極與皇后哲哲(博爾濟吉特氏，孝端文皇后，1599-1649)居住之所，當時已有外朝、內廷的區分。

⁶³ 馮明珠主編，《滿文原檔》，第2冊，〈張字檔〉，頁336-337。

⁶⁴ 參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註，《滿文老檔》，〈天命汗頒八子共議國政擇賢者為汗諭〉，「天命七年三月初三日」，頁345-347。

⁶⁵ 馮明珠主編，《滿文原檔》，第6冊，〈天字檔〉，頁3。

⁶⁶ 參見張晉藩、郭成康，《清入關前國家法律制度史》(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8)，頁36-49、54-70、95-99。

⁶⁷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註，《滿文老檔》，〈奉命制定元旦古萬壽節朝賀禮〉，「崇德元年五月十四日」，頁1462。滿文見馮明珠主編，《滿文原檔》，第10冊，〈日字檔〉，頁185-186。原檔「*gereme tanggū ging forire de*」，漢譯本作「鳴亮鐘時」，譯為「黎明敲亮鐘時」，較符滿文原意；「*tanggū ging*」，即「亮鐘」，指天亮時打的鐘聲。

先是，皇太極繼位後，元旦朝賀的禮制是國君與諸叔、兄併坐；自天聰六年(1632)元旦開始，「汗始南面獨坐，以尊重之」。是年正月初二日，皇太極「在家中」(*boode*)宴請大貝勒代善(1583-1648)、莽古爾泰(1587-1633)等，至院門外親迎，並讓代善坐中，代善以不敢違例堅辭，皇太極則曰：「出殿而坐(*tucifi tere de*)，乃國禮也(*gurun i doro*)；今行家禮(*ere booi doro*)，兄當中坐(*age dulumba de teci acambi*)。」⁶⁸可知皇太極已在禮節上區分內、外和家、國。另從「殿」(*ordo*，圓殿；*yamun*，衙門)和「宮」(*boo*，家屋)的滿文用字來看，新的元旦行禮流程，是進一步將「公」與「私」作連結。

崇德元年六月，定祭堂子相關規定，諭曰：

前以國小，未諳典禮，祭堂子、神位，並不齋戒，不限次數，率行往祭。今蒙天眷，帝業克成，故仿古大典，始行祭天。伏思天者，上帝也。祭天、祭神，亦無異也。祭天、祭神，倘不齋戒，不限次數，率行往祭，實屬不宜。嗣後，每月固山貝子以上各家，各出一人齋戒一日，於次早初一日，遣彼詣堂子神位前，供獻餅酒，懸掛紙錢。春、秋舉杆致祭時，固山貝子、固山福晉以上者往祭，祭前亦須齋戒。除此外，其妄率行祭祀之舉，永行禁止，著禮部傳諭週知。⁶⁹

在祭祀對象方面，是在部落祭堂子(*tangse wecembi*)、祭神(*enduri wecembi*)的傳統之外，新增「仿古大典」(*julgei amba kooli be alhūdame*)的祭天(*abka de wecembi*)儀式，並解釋為與祭神無異的活動。所謂「*julgei*」(古的)，若與天聰三年(1629)汗諭：「*julgei ebsi*(自古及今)*coohai horon i dain be necihiyeme*(莫不以武克敵)*bithei*

⁶⁸ 分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註，《滿文老檔》，〈更定諸貝勒大臣朝見制度〉，「天聰六年正月初一日」，頁1188；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註，《滿文老檔》，〈天聰汗召諸貝勒大臣入內慶賀元旦〉，「天聰六年正月初二日」，頁1188-1189。滿文見馮明珠主編，《滿文原檔》，第8冊，〈地字檔〉，頁51-52。其中，漢譯本將「*boode*」譯為「內廷」。

⁶⁹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註，《滿文老檔》，〈奉命制定祭堂子神位典禮〉，「崇德元年六月十八日」，頁1514。滿文見馮明珠主編，《滿文原檔》，第10冊，〈日字檔〉，頁281。

doroni gurun bedasame(以文治世)」所言武功、文治並重的「古」對照，⁷⁰當指古來的漢人政權；換言之，禮儀制定之初，便摻入漢式儀式。在歲時祭儀方面，明訂每月初一日祭堂子，以及春、秋兩季在堂子內舉杆(*siltan tukiymbi*)祭祀，不准時常前往。在與祭人員方面，則規定爵位在固山貝子以上的愛新覺羅家族成員方准參加，且須事先齋戒。究其原因，應與皇太極稱帝後援引「古制」(*julgei kooli*)以別上下有關，⁷¹亦即有意識地導入漢族政權的儀式，並創造其與滿洲傳統共處的條件，⁷²這個現象在入關後的國家祀典中不斷被複製，且儀式更加繁複。

其次，皇太極在稱帝前夕，先於盛京城東建太廟，安奉太祖(努爾哈齊)、太后(葉赫納喇氏，孟古格格，孝慈高皇后，1575-1603)、祖(塔克世)、曾祖(覺昌安)、高祖(福滿)、始祖(孟特穆，1370-1433)、伯祖(禮敦巴圖魯，覺昌安第一子)，以及兩位異姓勳臣額亦都(鈕祜祿氏，弘毅公，1562-1621)、費英東(瓜爾佳氏，直義公，1564-1620)，並仿明朝太廟「月朔薦新」之制，以時鮮食物祭獻；⁷³旋定「凡得新果、新糧穀，先薦太廟，然後進食」之例，祭太廟、福陵之禮，以及祭天、祭太廟儀注。⁷⁴在崇德年間(1636-1643)，又逐漸形成元旦祀典與太廟結合的新制，其程序為：

⁷⁰ 剛林等修，《*daicing gurun i taidzung genggiyen šu hūwangdi i yargiyan kooli*(大清太宗文皇帝實錄)》(東京：東洋文庫東北アジア研究班藏，初纂滿文本，マイクロフィルム資料)第5冊，頁20a。漢文見剛林等修，《大清太宗文皇帝實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初纂本)卷4，「天聰三年八月二十三日」條，頁16a，統一編號：故官001649。

⁷¹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註，《滿文老檔》，〈諭定言語書詞上下貴賤格式〉，「崇德元年六月初六日」，頁1496。滿文見馮明珠主編，《滿文原檔》，第10冊，〈日字檔〉，頁252-253。

⁷² 參見楠木賢道，〈清太宗皇太極的太廟儀式和堂子——關於滿漢兩種儀式的共處情況〉，頁129。

⁷³ 分見(清)鄂爾泰等修，《清實錄·太宗文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28，「天聰十年四月乙酉」條，頁23b-24a；(清)張廷玉等修，《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51，〈禮志·吉禮·薦新〉，頁1324。相關討論參見楠木賢道，〈清太宗皇太極的太廟儀式和堂子——關於滿漢兩種儀式的共處情況〉，頁126-128。

⁷⁴ 分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註，《滿文老檔》，〈汗諭凡得新果品糧穀先薦太廟〉，「崇德元年五月初十日」，頁1459；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註，《滿文老檔》，〈奉命定祭太廟福陵典

- 一、元旦黎明，王、大臣等俱著朝服，齊集於篤恭殿前。
- 二、鹵簿、大駕、樂器陳設畢，皇帝遣禮部官員上香燭於太廟。
- 三、皇帝著禮服，率諸王以下、副都統和侍郎以上各官，謁堂子行禮。
- 四、皇帝回清寧宮拜神，王以下大臣則於篤恭殿兩翼依序排班，禮部官則陳設外藩蒙古王、朝鮮國王等進表、貢禮。
- 五、皇帝陞殿，接受王以下各官，以及外藩、朝鮮等使臣行三跪九叩禮。
- 六、皇帝賜宴，畢，皇帝還清寧宮。⁷⁵

皇太極不僅加入漢族帝王祭祀宗廟的元素，以彰顯稱帝後的崇高地位；並於祭堂子之外，新增薩滿信仰的清寧宮拜神，則不忘展現滿洲中心的文化自主意識。

清寧宮各種祭神活動，大約是由信奉薩滿信仰的滿洲人家日常祭祀而來，惟關外時期沒有留存資料可供查閱。據《皇朝通典》言：「清寧宮正寢，恭設神位以祀神。至順治元年，定為坤寧宮祭神之禮，皆如清寧宮例」，⁷⁶則大內的薩滿歲時祭祀極為頻繁，包括：

每日，奉朝祭(*erde wecembi*)之神位於祭神殿，西位東向，日昃爽行禮；奉夕祭(*yamji wecembi*)神位於西北，南向，申刻行禮，惟齋戒、(帝后)忌辰並禁止屠宰等日期不祭，餘日皆祭。每月，朔則祭神(*wecembi*)，翼〔翌〕日則祭天(*metembi*)。季春(三月)、季秋(九月)月朔或二、四、八、十月，或上旬諏吉，則立杆大祭。前期一、二日，宮內報祭(*uyun jafambi*)、大祭(*ambaram wecembi*)之日，恭請神位，於堂子內祭畢，復請入宮。大

禮》，「崇德元年六月初一日」，頁 1489；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註，《滿文老檔》，〈奉命制定祭天祭祖廟典禮〉，「崇德元年七月十四日」，頁 1538-1539。

⁷⁵ 參見(清)伊桑阿等纂修，《大清會典(康熙朝)》，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臺北：文海出版社，1992)第 72-73 輯第 711-730 冊，卷 40，〈禮部·儀制清吏司·元旦朝賀儀〉，頁 10a-11a。崇德元年(1636)，定宮殿名稱，「大衙門」改稱「篤恭殿」，但滿文仍寫作「*amba dasan i yamun*」(大政殿)。分見(清)剛林等修，《大清太宗文皇帝實錄》，卷 22，「崇德元年四月十三日」條，頁 56a，統一編號：故宮 001667。滿文見馮明珠主編，《滿文原檔》，第 10 冊，〈日字檔〉，頁 119。

⁷⁶ (清)嵇璜等奉敕撰，《欽定皇朝通典》，卷 43，〈禮·吉禮·大內祭神之禮〉，頁 28a-28b。

祭翼〔翌〕日，則祭天。春、夏、秋、冬四季，則有獻神(*ulin gidambi*)之祭，……歲於十二月二十六日，恭請神位，供於堂子。正月初二日，自堂子恭請神位入宮。四月初八日浴佛節(*fucihi oboro doroi wecembi*)，請神至堂子，禮畢，請神還宮。⁷⁷

上述內容，與堂子共同形成一套完整的薩滿歲時祭儀。但在坤寧宮舉行的朝祭、夕祭、月祭、報祭、大祭、獻神、浴佛等祭祀活動，皇帝未必親臨，外朝官員亦不必陪祀，則屬皇室的祭儀。⁷⁸

順治年間，元旦祭堂子的規定有若干增訂。順治二年(1645)定，每年元旦皇帝親詣堂子事，應由禮部預期題請，⁷⁹建立辦理祀典行政流程的制度。其次，順治皇帝(福臨，清世祖，1638-1661，1644-1661 在位)親政後，將「孝治天下」的治國理念，⁸⁰植入元旦祀典行程中，包括：一、順治八年(1651)，定皇帝謁堂子行禮、坤寧宮行禮畢，先率大臣等「詣皇太后宮(慈寧宮)行禮」，再往太和殿接受群臣、使臣等朝賀。⁸¹二、順治十四年(1657)，內廷興建奉太祖、太宗神位的奉先殿告成，並於順治十七年(1660)納入元旦行禮的程序。⁸²又康

⁷⁷ (清)穆璜等奉敕撰，《欽定皇朝通典》，卷 43，〈禮·吉禮·大內祭神之禮〉，頁 28b-30a。

⁷⁸ 參見(清)允祿等奉敕撰，阿桂、于敏中等譯漢，《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卷 1，〈坤寧宮月祭儀注〉、〈祭神翌日祭天儀注〉，頁 24a-36b、頁 42a-46b；(清)允祿等奉敕撰，阿桂、于敏中等譯漢，《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卷 2，〈坤寧宮常祭儀注〉、〈四季獻神儀注〉、〈浴佛儀注〉，頁 1a-12a、頁 18a-19b、頁 21a-25b；(清)允祿等奉敕撰，阿桂、于敏中等譯漢，《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卷 3，〈報祭儀注〉、〈堂子立杆大祭儀注〉、〈坤寧宮大祭儀注〉、〈大祭翌日祭天儀注〉，頁 1a-12a、頁 18b-25b、頁 27a-39b、頁 46a-50b；鄭天挺，〈滿洲入關前後幾種禮俗之變遷〉，頁 38。

⁷⁹ (清)伊桑阿等纂修，《大清會典(康熙朝)》，卷 65，〈禮部·祠祭清吏司·群祀·堂子〉，頁 2b。

⁸⁰ (清)鄂爾泰等修，《清實錄·世祖章皇帝實錄》，卷 59，「順治八年八月丙寅」條，頁 19b。

⁸¹ (清)伊桑阿等纂修，《大清會典(康熙朝)》，卷 40，〈禮部·儀制清吏司·元旦朝賀儀〉，頁 11b。

⁸² 順治十三年(1656)，順治皇帝以「太廟時享，孝思未申，命稽往制，建立奉先殿」，設太祖、太宗帝后神位，於次年告成；順治十七年(1660)，定：嗣後「凡遇元旦、萬壽節、皇太后聖旦，俱奉太廟後殿四祖(肇祖〔孟特穆〕、興祖〔福滿〕、翼祖〔覺昌安〕、顯祖〔塔克世〕)神位，與太祖、太宗合享於奉天殿」，成為定制。分見(清)

熙朝前期，皇祖母(博爾濟吉特氏，布木布泰，孝莊文皇后，1613-1688)尚在，自康熙八年(1669)起，康熙皇帝在往皇太后宮行禮前，增加詣太皇太后的行程。⁸³

雖然《大清會典》論述國家祀典的建立，係「爰自太宗建壇立廟，大祀肇興。世祖乘時定制，群祀具舉」，復經康熙皇帝「考定樂章，禮文悉備」，從中央至地方俱有祀典，成為「一代典則」，⁸⁴實則是以明制為基礎而略有調整。⁸⁵康熙朝依祀典的性質，分為「大祀」、「中祀」、「小祀」，以天壇(圜丘)、地壇(方澤)、祈穀壇、太廟、社稷為大祀，由皇帝親祭，或遣官恭代；朝日壇、夕月壇、歷代帝王廟、文廟、先農壇為中祀，由皇帝親祭，或遣官致祭；太歲、神祇等壇，先醫、東嶽、城隍等廟為小祀，每年遣官致祭，⁸⁶惟堂子不在其中。另有「郊祀」、「群祀」之分，以圜丘、方澤、朝日壇、夕月壇、祈穀、恭禱郊壇儀(雩祀)、太享殿合祀儀、社稷壇、神祇壇(以雲、雨、風、雷之神為天神)、太歲壇等為「郊祀」，⁸⁷而堂子則與歷代帝王、先聖先師、先師孔子、

伊桑阿等纂修，《大清會典(康熙朝)》，卷 60，〈禮部·祠祭清吏司·廟祀·奉先殿〉，頁 16b；(清)伊桑阿等纂修，《大清會典(康熙朝)》，卷 62，〈禮部·祠祭清吏司·祭告儀〉，頁 8a。

⁸³ (清)伊桑阿等纂修，《大清會典(康熙朝)》，卷 40，〈禮部·儀制清吏司·元旦朝賀儀〉，頁 14a。

⁸⁴ (清)伊桑阿等纂修，《大清會典(康熙朝)》，卷 55，〈禮部·祠祭清吏司·祭祀通例〉，頁 1a-1b。

⁸⁵ 康熙朝訂定「祭祀通例」，是建立在明制基礎上，《明會典》曰：「國初，以郊廟(圜丘、方澤、祈穀、雩祀、太廟)、社稷、先農俱為大祀，後改先農及山川、帝王、孔子、旗纛為中祀，諸神為小祀。嘉靖中，以朝日、夕月、天神、地祇為中祀。」見(明)申時行等修，《明會典》，卷 81，〈禮部·祠祭清吏司·祭祀通例〉，頁 460。

⁸⁶ (清)伊桑阿等纂修，《大清會典(康熙朝)》，卷 55，〈禮部·祠祭清吏司·祭祀通例〉，頁 1a-3b。「中祀」的規定較為複雜，遇甲、丙、戊、庚、壬年，皇帝親祭朝日壇；遇丑、辰、未、戌年，皇帝親祭夕月壇，或遣官恭代，其餘各年，遣官致祭；皇帝親祭歷代帝王廟、文廟；先農壇，係特行曠典，每年遣官致祭。

⁸⁷ 參見(清)伊桑阿等纂修，《大清會典(康熙朝)》，卷 55，〈禮部·祠祭清吏司·郊祀〉，頁 11b-40b；(清)伊桑阿等纂修，《大清會典(康熙朝)》，卷 56，〈禮部·祠祭清吏司·郊祀〉，頁 1a-49a；(清)伊桑阿等纂修，《大清會典(康熙朝)》，卷 57，〈禮部·祠祭清吏司·郊祀〉，頁 1a-13a、頁 24a-38b；(清)伊桑阿等纂修，《大清會典(康熙朝)》，卷 58，〈禮部·祠祭清吏司·郊祀〉，頁 1a-9b、頁 15a-17a、頁 22a-27b。

先農、先醫等列為「群祀」。⁸⁸所謂「群祀」，先秦時期指「在祀典者」，⁸⁹其義原同於「小祀」；⁹⁰康熙朝將部分「中祀」的祭儀與「小祀」合為「群祀」，顯示入關初期仿行明制的禮儀體系尚處於調整階段。就「皇帝親祭」而言，每年春正月朔，皇帝「詣堂子行禮，還宮，拜神」，是例行性活動，康熙皇帝在位期間，只有康熙四十八年(1709)因「有疾，今雖痊愈尚覺軟弱，元旦不能詣堂子行禮，於宮中拜神」，⁹¹則堂子在國家祀典中的位階，或當列於「中祀」。

降及乾隆朝，《大清會典》所定「祭統」，是以圜丘、方澤、祈穀、雩祀、太廟、社稷為「大祀」；以日、月、前代帝王、先師孔子、先農、先蠶、天神、地祇、太歲為「中祀」；以先醫等廟，賢良、昭忠等祠為「群祀」。⁹²至於堂子，則在乾隆朝前期纂修《會典》的過程中(乾隆十二年至二十九年，1747-1764)，於乾隆十七年(1752)奉旨，將「堂子祀典載入內務府《會典》」，⁹³亦即籌辦與執行祭祀的事務，從禮部祠祭清吏司改由內務府掌儀司負責，似限縮為皇

⁸⁸ 參見(清)伊桑阿等纂修，《大清會典(康熙朝)》，卷 63，〈禮部·祠祭清吏司·群祀〉，頁 1a-1b；(清)伊桑阿等纂修，《大清會典(康熙朝)》，卷 64，〈禮部·祠祭清吏司·群祀〉，頁 1a-23a；(清)伊桑阿等纂修，《大清會典(康熙朝)》，卷 65，〈禮部·祠祭清吏司·群祀〉，頁 1a-22a。

⁸⁹ (周)左丘明撰，(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唐)陸德明音義，《春秋左傳注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第 143-144 冊，卷 31，〈傳·襄公十一年四月〉，「杜預注」，頁 28a。

⁹⁰ 《周禮·春官·肆師》曰：「立大祀用玉帛、牲醴，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鄭玄(127-200)注：「鄭司農曰：『大祀，天地；次祀，日月星辰；小祀，司命以下。』」玄謂：『大祀又有宗廟，次祀又有社稷，五祀五嶽，小祀又有司中、風師、山川、百物。』」見(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唐)陸德明音義，《周禮注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第 90 冊，卷 19，〈春官·肆師〉，頁 16b-17a。

⁹¹ (清)馬齊等修，《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三)》(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 235，「康熙四十七年十二月庚午」條，頁 32a-32b。康熙四十七年(1708)九月，康熙皇帝第一次廢太子(胤初，1674-1725)，心情大受影響，「遂至心氣不寧，精神恍惚」，自此健康情形每況愈下。見(清)馬齊等修，《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三)》，卷 235，「康熙四十七年十一月丙戌」條，頁 19a。

⁹² (清)允禩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乾隆朝)》，卷 36，〈禮部·祠祭清吏司·吉禮·祭統〉，頁 1a-2b。

⁹³ (清)允禩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則例》，卷 161，〈內務府·掌儀司·元日〉，頁 41b。

室內部的典禮。然而，每年元旦皇帝率王公、滿一品文武官詣堂子、行拜天禮，仍由禮部預期請旨，屆期由禮部堂官奏請、恭導皇帝行進，⁹⁴作為內廷與外朝的連結，但不列入每年各壇廟祭祀齋戒日期；⁹⁵其〈元旦皇上親詣堂子行禮儀注〉，則由禮部祠祭清吏司奏報。⁹⁶

值得注意的是，康熙十二年(1673)官方有「嗣後祭堂子，漢堂官不隨往」的規定，⁹⁷此舉對堂子在禮制上的意義，學者有不同的見解。一是認為堂子原本屬於「公」的祭祀場所，因統治族群多元化，而從國家性的祭祀，朝向旗人各家的私人祭祀。⁹⁸一則是主張堂子祭禮的參加者，都是滿洲貴族、八旗官員和滿洲高級文臣武將，是征服者精英集團的國家級祭禮。⁹⁹雖然堂

⁹⁴ 參見(清)允禩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乾隆朝)》，卷 88，〈內務府·掌儀司·祀堂子之禮〉，頁 17b-19a。另春、秋兩季立杆祭神，則由內務府諏吉，皇帝行進仍由禮部堂官奏請、恭導。參見(清)允禩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乾隆朝)》，卷 88，〈內務府·掌儀司·立杆祭神於堂子之禮〉，頁 19a-22a。

⁹⁵ 由禮部承辦的各壇廟祭祀、齋戒日期選定程序為：「禮部於每歲九月中，劄欽天監選擇。該監擇定，於十月中，開送祀冊至部，隨劄知太常寺。於每祭祀前，預行具題」。禮部據欽天監選擇日期題准後，行文各衙門，轉飭所屬，一體遵照。分見(清)伊桑阿等纂修，《大清會典(康熙朝)》，卷 55，〈禮部·祠祭清吏司·祭祀通例〉，頁 1b；〈禮部·移會典籍廳恭照乾隆五十九年甲寅年各壇廟祭祀齋戒日期經本部據欽天監選擇題進在案相應開列粘單行文各衙門轉飭所屬一體遵照〉，「乾隆五十八年十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內閣大庫檔案資料庫》，登錄號：095302。

⁹⁶ 《內閣大庫檔案》有乾、嘉、道三朝禮部祠祭清吏司奏報〈元旦皇上親詣堂子行禮儀注〉十餘件，時間最早為乾隆二十年(1755)奏報次年的〈儀注〉，各件內容多相同，較《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為詳，但比《會典》簡略許多。參見〈禮部祠祭司·移會內閣典籍廳奏報乾隆二十一年元旦皇上親詣堂子行禮儀注〉，「乾隆二十年十二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內閣大庫檔案資料庫》，登錄號：103093；(清)允祿等奉敕撰，阿桂、于敏中等譯漢，《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卷 1，〈堂子亭式殿元旦行禮儀注〉，頁 18a-18b；(清)伊桑阿等纂修，《大清會典(康熙朝)》，卷 40，〈禮部·儀制清吏司·元旦朝賀儀〉，頁 14a-17a。

⁹⁷ (清)伊桑阿等纂修，《大清會典(康熙朝)》，卷 65，〈禮部·祠祭清吏司·群祀·堂子〉，頁 4b。

⁹⁸ 參見石橋崇雄，〈清初祭天儀禮考〉，收入石橋秀雄編，《清代中国の諸問題》(東京：山川出版社，1995)，頁 57-92。

⁹⁹ 參見羅友枝(Evelyn S. Rawski)著，周衛平譯，《清代宮廷社會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頁 291-294。羅友枝聚焦在滿洲統治精英的觀點，能凸顯滿洲政治文化的主體性，但未區分元旦行禮、立杆祭天的儀式意義和參與人員的不同，則有待商榷。

子的性質出現轉變，但不影響元旦行禮祀典的意義，亦即是由奉先殿和太廟祀祖、堂子祭天、清寧宮拜神共同組成，並且是唯一與薩滿信仰連結的歲時國家祀典。

又漢官不再隨行，造成「漢官無知者，詢之滿洲官，亦不能言其詳」，¹⁰⁰使堂子蒙上一層神秘色彩，也不乏以訛傳訛者。¹⁰¹清人傳說多以堂子與祭祀「鄧將軍」有關，主要說法有二：一是在朝鮮壬辰戰爭(明萬曆二十年至二十六年〔1592-1598〕)陣亡的明副將鄧子龍(?-1598)，「蓋子龍與太祖有舊誼，故附祀之」；¹⁰²一是明成化年間(1465-1487)定遼前衛指揮使鄧佐(?-1467)，在奉集堡遇敵，兵敗自刎，「遼人見佐乘白馬、挾弓，鼓吹而同，佐家亦聞鼓吹聲，守臣上其事，立祠遼陽」，「撫順境外部落，凡有疫癘，禱之立應，至今滿洲跳神皆祠之」。¹⁰³參加元旦覲見朝賀禮的朝鮮使臣，看到皇帝在黎明時先往堂子，過一陣子，回來繼續賀歲儀式，而多所想像，認為皇帝是去暗中祭拜當年為清軍所殺的明朝將軍鄧子龍或提督劉綎(1553-1619)。¹⁰⁴清末，署湖南

¹⁰⁰ (清)吳振棫，《養吉齋叢錄》(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卷7，頁65。

¹⁰¹ 據清末太監信修明(1878-1959)的回憶：「堂子為清初祭祖之地，典禮特隆，與太廟並重。然太廟因漢禮而定，堂子純用滿洲禮俗。祭時以夜，不能用燈，祭文用滿洲語。」他對堂子的理解真假參半，例如：堂子與太廟並重，用滿洲禮俗和滿洲語，符合實情；但堂子並非祭祖而是祭天，且所言「祭時以夜，不能用燈」，則與坤寧宮夕祭、背燈祭(tuibumbi，夜晚跳神完畢後，熄燈，再祈求一次)混為一談。信修明遺著，亞倫整理，《老太監的回憶》(北京：燕山出版社，1987)，〈堂子之神秘〉，頁56。

¹⁰² (清)昭槤，《嘯亭雜錄》(北京：中華書局，1980)卷8，〈堂子〉，頁231。此說最早似見於《北游錄》，曰：「副總兵南昌鄧子龍。領眾援朝鮮，渡鴨綠江。有物觸舟，取視之，乃沉香一段，把握良久，曰：『宛似人頭。』愛護之。每入夢，則香木與人首或對或協而為一。後陣沒，喪其元，歸骸以香木雕其首，酷肖子龍。今建州人立廟事之甚謹，謂其神能制死命也。□□奴□建特廟于朝門之巽隅，丹楹黃瓦，元日臨祭，餘常輦入大內，由中門導從甚盛，□不是過也。」見(清)談遷，《北游錄》(北京：中華書局，1960)，〈紀聞上·鄧將軍廟〉，頁316。

¹⁰³ (清)楊賓，《柳邊紀略》(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3，頁56。近人對堂子所祀「鄧將軍」頗有討論，孟森認為是鄧佐，考證尤詳。參見孟森，〈清代堂子所祀鄧將軍考〉，頁311-323。

¹⁰⁴ 參見葛兆光，〈堂子或祀鄧將軍？正月初一所見之大清宮廷秘事〉，收入葛兆光，《想像異域：讀李朝朝鮮漢文燕行文獻札記》(北京：中華書局，2014)，頁167-168、173-176。

布政使吳慶坻(1848-1924)轉述禮部員外郎羅文彬(1845-1903)的說法，曰：「堂子在御河橋西，屋三楹，不甚闊敞，中無神位，無陳設。祭之日，無祭品，但有香爐一事，元旦皇上親詣行禮，焚香於爐而已。」¹⁰⁵就《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饗殿內陳設祭器》所載，(參見圖 6)並非無陳設、無祭品，至於其中唯一與「神位」有關的陳設「安放供金佛亭紅漆座」(*aisin i fucihi doboho ordo sindara cinuhūn simenggilehe teku*)，是為浴佛時自坤寧宮請來的「金佛亭」而設。¹⁰⁶

四、堂子與戰爭祭祀

皇帝除於每年元旦親祭堂子之外，「國家有征討大事，必親祭告」；¹⁰⁷《皇朝文獻通考》則曰：「太祖高皇帝建國之初，有謁拜堂子之禮，……出征、凱旋則列蠶而告」，¹⁰⁸惟戰爭祭堂子與「列蠶而告」，兩種儀式實歷經一番整合的過程。就「列蠶而告」而言，壬子年(萬曆四十年〔1612〕)，努爾哈齊親征海西女真烏喇部，在烏喇大城外的金州城紮營，於戰前出迎「祭蠶」(*tu wecembi*)；¹⁰⁹天命四年(1619)，明、金薩爾滸之戰期間，努爾哈齊大破明兵，於界藩城「刑八牛祭蠶告天」；¹¹⁰天命八年，努爾哈齊在距瀋陽城四十里的古城寶南郊，迎接出征蒙古的眾貝勒，「以凱旋禮祭蠶拜天」，¹¹¹分別在出征、戰間、凱旋舉行祭蠶儀式。就戰爭祭堂子而言，天命三年九月，明出兵襲擊納林穀場，殺七十人後退去，邊境臺丁偵得明兵出邊，擊雲板(*pan*，梆子)

¹⁰⁵ (清)吳慶坻，《蕉廊脞錄》(北京：中華書局，1990)卷 1，〈祭堂子典禮〉，頁 1-2。

¹⁰⁶ 參見(清)允祿等奉敕撰，阿桂、于敏中等譯漢，《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卷 2，〈浴佛儀注〉，頁 21a-25b。

¹⁰⁷ (清)和坤等奉敕撰，《大清一統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第 474-483 冊，卷 1，〈京師·壇廟〉，頁 11a。

¹⁰⁸ (清)嵇璜等奉敕撰，《欽定皇朝文獻通考》，卷 99，〈郊社考·堂子〉，頁 1a-1b。

¹⁰⁹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註，《滿文老檔》，〈滅烏拉部〉，「壬子年十月初一日」，頁 12-13。

¹¹⁰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註，《滿文老檔》，〈明兵與金軍戰於薩爾滸等地〉，「天命四年三月初一日」，頁 77。

¹¹¹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註，《滿文老檔》，〈天命汗出迎征蒙古凱旋之眾貝勒〉，「天命八年五月初五日」，頁 480。

告警，旋即傳至汗城(赫圖阿拉)，汗往祭堂子後，遂攜大貝勒及其諸弟，率城中所有馬兵，立刻起行；¹¹²然稍早以「七大恨告天」，誓師伐明，卻無告祭堂子的儀式。至天命十年(1625)，駐守耀州諸大臣擊敗明軍，解送所獲馬匹、甲冑等物前來，努爾哈齊「迎之，祭堂子後，於十里外殺牛祭纛」，¹¹³始見兩者的並舉的紀錄。

皇太極繼位後，出征前往謁堂子的事例漸多。例如：天聰元年，皇太極率領諸貝勒、大臣往征明錦州等地，先出瀋陽城往東，謁堂子畢，始西行出邊；¹¹⁴天聰二年(1628)，遣貝勒阿巴泰(1589-1646)、岳托(1598-1638)等率兵往略明地，「汗出謁堂子，送出征貝勒於十里外」。¹¹⁵天聰元年四月，貝勒阿敏(1585-1640)征朝鮮凱旋，可以看到儀式進行的過程。先是，隨阿敏出征的眾蒙古貝勒渡鴨綠江後，即「先自出征處還家」，引起預計往迎的大汗不悅，下令將眾貝勒驅逐回營，從者囚禁至大軍返抵後方准釋放。¹¹⁶阿敏遣人來奏，「但出迎於瀋陽城附近，拜堂子即可」；皇太極以「招服朝鮮，聲明宣播，與兄貝勒互行拜見之禮，外國人聞之，愈彰其美」為由，堅持出迎。¹¹⁷十七日，出迎之日，汗在武靖營(*u jing ing*)荒地紮營。出征諸貝勒先至，相距八里外駐營。當晚，商議相見禮。十八日晨，大汗在御營一里外設行幄(*cacari*，幕帳)，待統兵諸貝勒近前按次排列，即豎纛拜天，行三跪九叩禮；禮畢，阿敏貝勒、出征台吉諸臣依序向大汗行跪拜禮；繼之，留守眾台吉和凱旋眾台吉行相見禮，在完成繁複的跪見、抱見禮儀後，再至祭纛所，祭纛畢，各自還營。十

¹¹²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註，《滿文老檔》，〈地震、出兵收割沿邊糧禾，於界藩築城〉，「天命三年九月初四日」，頁 67。

¹¹³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註，《滿文老檔》，〈駐耀州大臣解所獲明軍之馬匹等物前來〉，「天命十年八月初八日」，頁 636。

¹¹⁴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註，《滿文老檔》，〈皇太極率兵往征明錦州、大凌河、小凌河等地〉，「天聰元年五月初六日」，頁 845。

¹¹⁵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註，《滿文老檔》，〈天聰汗致明諸臣書，濟爾哈朗等往征古特依塔布囊〉，「天聰二年五月十一日」，頁 884。

¹¹⁶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註，《滿文老檔》，〈皇太極斥責出征蒙古諸貝勒先還家〉，「天聰元年四月初十日」，頁 840。

¹¹⁷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註，《滿文老檔》，〈皇太極出迎統兵諸將〉，「天聰元年四月十五日」，頁 840。

九日，論出征人功，行賞；二十日，返回瀋陽城，首先謁堂子，¹¹⁸凱旋之禮始完成。嗣後，大軍凱旋時，「汗出迎—祭纛拜天—汗與出征諸貝勒等依次行禮抱見—分賞將士—謁堂子」漸成慣例。¹¹⁹皇太極稱帝後，出征、凱旋謁堂子時，更有設儀仗，吹奏喇叭(*laba*)、噴吶(*bileri*)、海螺(*yehere buren*)、蒙古角(*monggo buren*)等樂器，並於堂子外豎八纛。¹²⁰滿洲統治者強調尚武精神與軍事價值，為征戰舉行典禮自是有跡可循；以戰爭為中心所形成的祀典，則隨著政權擴大而制度化。

順治八年，研議諸王、文武群臣陪祭、扈從，及接、送駕儀注，其中有關出師至堂子行禮者，詳列皇帝出宮、堂子行禮、還宮的路線，以及留京、出征諸王、大臣隨行等排班的次序，¹²¹是明文訂定出征祭堂子禮之始。順治十五年(1658)正月，因明桂王(朱由榔，永曆帝，1623-1662，1646-1662 在位)麾下大將孫可望(?-1660)來降，朝廷命信郡王多尼(1636-1661)為安遠靖寇大將軍率師出征雲南。禮部以將征雲南，奏出兵儀注，惟順治皇帝指示，「既因祭太廟齋戒，不必筵宴，其詣堂子，著永行停止，餘俱照定例行」，¹²²「傳統」為之中斷。

直到三藩戰爭(康熙十二年至二十年〔1673-1681〕)爆發，康熙皇帝於康熙十三年(1674)正月遣寧南靖寇大將軍順承郡王勒爾錦(?-1706)至湖廣、安西將軍

¹¹⁸ 參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註，《滿文老檔》，〈皇太極出迎統兵諸將〉，「天聰元年四月十八日至二十日」，頁 841-843。

¹¹⁹ 例如：天聰二年(1628)五月，往略錦州、松山一帶凱旋；崇德元年(1636)十月，出征明國寧遠、錦州一帶凱旋，都舉行相同的儀式。分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註，《滿文老檔》，〈往征貝勒岳託等還瀋陽〉，「天聰二年五月二十三日」，頁 885；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註，《滿文老檔》，〈汗出迎凱旋諸王大臣等〉，「崇德元年十月初二日」，頁 1609-1610。

¹²⁰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註，《滿文老檔》，〈汗親統大軍出征〉，「崇德元年十二月初一日」，頁 1718。滿文見馮明珠主編，《滿文原檔》，第 10 冊，〈字字檔〉，頁 696。

¹²¹ 參見(清)鄂爾泰等修，《清實錄·世祖章皇帝實錄》，卷 56，「順治八年四月戊申」條，頁 4b-6b。

¹²² (清)鄂爾泰等修，《清實錄·世祖章皇帝實錄》，卷 114，「順治十五年正月壬寅」條，頁 4a。

都統赫業赴四川應戰時，恢復詣堂子行禮：康熙皇帝在太和殿授予出征王等敕印後，親率「出征王、貝勒、都統、副都統等，及在京諸王、貝勒、貝子、公等，內大臣、大學士、都統、尚書等，詣堂子行禮畢。隨陳設大纛八桿，鳴號拜纛畢。出西長安門里許，目送領兵王、貝勒等啟行後，回宮」。¹²³康熙朝《大清會典》將上述儀式稱為「命將出征儀」，但言：「是年(康熙十三年)七月，上命王、貝勒、大臣為大將軍、將軍領兵出征，一應儀注如前儀。惟不詣堂子行禮，不親送大將軍等出午門，遣內大臣出西長安門往送。其送茶禮儀，亦與前同。」¹²⁴所謂「一應儀注如前儀」，是指出征王及各官俱著征服，齊集午門外，皇帝在太和殿頒授敕印、賜茶的儀式；¹²⁵換言之，命將出征只舉行前半段儀式。事實上，當年十月，分別命揚威大將軍簡親王喇布(1654-1681)、定遠平寇大將軍安親王岳樂(1625-1689)出征，仍舉行詣堂子、鳴號、拜纛、皇帝目送的儀式。¹²⁶

康熙三十五年(1696)二月，用兵準噶爾，是入關後皇帝第一次御駕親征。¹²⁷康熙皇帝親統六師出征，其儀式為：行前，分遣內大臣國舅佟國維(?-1719)等告祭於天、地、宗廟、社稷、太歲壇。康熙皇帝恭詣皇太后宮問安畢，出；午門排儀仗，率諸王、文武大臣詣堂子行禮，將至，鳴角，入堂子行禮畢，出內門，致禮於其纛。既畢，出德勝門，至排軍處，三舉礮，八旗前鋒、護

¹²³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整理，《康熙起居注》(北京：中華書局，1984)第1冊，「康熙十三年正月初十日乙亥」，頁146。

¹²⁴ (清)伊桑阿等纂修，《大清會典(康熙朝)》，卷45，〈禮部·儀制清吏司·命將出征儀〉，頁21a。

¹²⁵ 參見(清)伊桑阿等纂修，《大清會典(康熙朝)》，卷45，〈禮部·儀制清吏司·命將出征儀〉，頁18b-19b。

¹²⁶ 分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整理，《康熙起居注》，第1冊，「康熙十三年十月初二日壬辰」，頁177-178；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整理，《康熙起居注》，第1冊，「康熙十三年十月初六日丙申」，頁178。

¹²⁷ 康熙二十九年(1690)，準噶爾汗噶爾丹(1644-1697)攻打漠北喀爾喀蒙古，旋即入據漠南，進逼清朝汛界，康熙皇帝即下令親征，惟師出不久便因「寒燠不常，似難調攝」，只得先行返京。見(清)馬齊等修，《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二)》，卷147，「康熙二十九年七月壬子」條，頁23a。

軍、火器營兵分兩翼，以次排列；駕過官兵，各整隊伍，相隨進發。¹²⁸是年六月，康熙皇帝親征凱旋，其過程為：入京前，自清河起行，大設鹵簿，皇太子率諸皇子及在京文武大小官員，出郊外五里許迎接；八旗護軍、驍騎、步軍及近京居住官員、士民、工商、男婦等，俱扶老攜幼，陳設香案，沿門結綵，各執香跪迎。康熙皇帝進德勝門，詣堂子行禮畢，回宮。¹²⁹康熙三十六年(1697)再次親征噶爾丹，雖未祭堂子，¹³⁰但凱旋時仍詣堂子行禮。¹³¹值得注意的是，康熙三十五年親征告捷時，准國子監祭酒孫岳頒(?-1708)「昭告文廟，勒石太學」之請，更將「碑文摹搨，頒發各省學宮」。¹³²康熙三十七年(1698)，頒布御製〈平定朔漠告成太學碑〉，曰：「古者文事、武事為一，折衝之用，具在樽俎之間。故受成獻馘，一歸於學，此文武之盛制也」。¹³³嗣後，戰爭告戴立碑太學，遂成定制。

降及乾隆十三年(1748)，出兵金川，是役原由大學士訥親(?-1749)領軍，因先勝後敗，改派大學士傅恆(1721-1770)代任經略，乾隆皇帝在堂子舉行「命

¹²⁸ (清)庫勒納等奉敕撰，《清代起居注·康熙朝》(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9)第7冊，「康熙三十五年二月三十日丙辰」，頁T03732-T03736。另參見(清)允祿等監修，《大清會典(雍正朝)》，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臺北：文海出版社，1995年)第77-79輯第761-790冊，卷63，〈禮部·儀制清吏司·聖駕親征〉，頁2b-5a，對出征儀式過程的紀錄甚為詳細。

¹²⁹ (清)庫勒納等奉敕撰，《清代起居注·康熙朝》，第8冊，「康熙三十五年六月初九日癸巳」，頁T04322-T04325。另參見(清)允祿等監修，《大清會典(雍正朝)》，卷63，〈禮部·儀制清吏司·聖駕凱旋儀〉，頁11a-14a。

¹³⁰ 據《起居注》載：「(二)月初六日，上巡行邊塞，區畫軍務，由神武門陳設鹵簿，出德勝門。」見(清)庫勒納等奉敕撰，《清代起居注·康熙朝》，第9冊，「康熙三十六年二月初六日丁亥」，頁T04931。

¹³¹ (清)庫勒納等奉敕撰，《清代起居注·康熙朝》，第10冊，「康熙三十六年五月十六日乙未」，頁T05704-T05705。另參見(清)允祿等監修，《大清會典(雍正朝)》，卷63，〈禮部·儀制清吏司·聖駕凱旋儀〉，頁15a-16b。

¹³² (清)馬齊等修，《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二)》，卷174，「康熙三十五年七月己巳」條，頁15b。

¹³³ (清)清聖祖御製，張玉書等奉敕編，《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第二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第1298-1299冊，卷34，〈碑文·平定朔漠告成太學碑〉，頁4a。

將出征儀」。¹³⁴次年二月，戰事告戢，軍機大臣奏准依例遣官祭告天、地、宗廟、社稷，並恭請御製文勒石太學。¹³⁵未幾，乾隆皇帝發現，大軍凱旋竟因在太學立碑，而不在堂子行禮已久，乃藉修《會典》的機會，指示大學士傅恆、張廷玉(1672-1755)等詳加研議，諭曰：

堂子之祭，乃我朝先代循用通禮，所祭之神，即天神也。……堂子則舊俗相承，遇大事及春、秋季月上旬，必祭天祈報，歲首最先展禮。定鼎以來，恪遵罔怠，且不易其名，重舊制也。……兵戎，國之大事，故命遣大將，必先有事於堂子，正類祭遺意；而列蠡行禮，則禡也。我祖宗於行營中，或別有征討，不及歸告堂子，則望祭而列蠡行事，其誠敬如此。朕思出師告遣，則凱旋即當告至，乃天、地、宗(廟)、社(稷)，俱已祝冊至度，且受成太學，而堂子則弗之及，祠官疏略，如神貺何？祀典攸關，彝章宜備，著議政王大臣等，詳悉具議，朕親為裁定，載入《會典》。¹³⁶

乾隆皇帝將堂子所祭之神，明確地將之定位為「天神」，¹³⁷不僅與入關以來視雲、雨、風、雷之神為「天神」不同，¹³⁸且將滿洲出征、行軍間的祭祀活

¹³⁴ (清)來保等奉敕撰，《平定金川方略》，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第356冊，卷15，「乾隆十三年十月壬子」，頁16a-18b。

¹³⁵ (清)慶桂等奉敕修，《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五)》，卷335，「乾隆十四年二月甲午」條，頁3a-3b。

¹³⁶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帝起居注》(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第8冊，「乾隆十四年四月二十九日丙午」，頁143-144。

¹³⁷ 雖然崇德元年(1636)六月的上諭將「仿古大典」的祭天，與堂子的祭天、祭神等同視之，但在舉行儀式時，仍有明確的區別。例如：《太宗文皇帝實錄》初纂本(1652)崇德二年(1637)曰：「十一月初六日，冬至，郊天。上同文武各官，先期齋戒三日」；定本(1739)則曰：「冬至，大祀天於圓丘，上先期齋戒三日」。初纂本的「郊天」，滿文作「*abkai tan wecere de*(祭天壇時)」，定本「大祀天於圓丘」滿文作「*abka be abkai tan de wecehe*(在天壇祭天)」，屬於漢制的祭天儀式。分見(清)剛林等修，《大清太宗文皇帝實錄》，卷26，「崇德二年十一月初六日」條，頁57a，統一編號：故宮001550；(清)剛林等修，《*daicing gurun i taidzung šu hūwangdi yargiyan kooli*(大清太宗文皇帝實錄)》，卷39，頁15a-15b；(清)鄂爾泰等修，《清實錄·太宗文皇帝實錄》，卷39，「崇德二年十一月乙丑」條，頁12b；(清)鄂爾泰等修，《*daicing gurun i taidzung genggiyen šu hūwangdi i yargiyan kooli*(大清太宗文皇帝實錄)》，卷39，頁21a-21b，統一編號：故宮012631。

¹³⁸ (清)伊桑阿等纂修，《大清會典(康熙朝)》，卷58，〈禮部·祠祭清吏司·神祇壇〉，頁15a。

動，等同於漢族傳統祭昊天與五帝的「類祭」，¹³⁹於軍隊行止處祭祀的「禡祭」，¹⁴⁰據以論證祭堂子在本民族戰爭祭祀中的重要地位。

與軍事、戰爭相關的各種儀式，是以八旗王公、將士為主體，在乾隆朝已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¹⁴¹以展現軍事實力、三年舉行一次的「大閱」為例，事先由八旗都統各帥所部訓練成式，再由總理王公大臣合八旗將校、甲兵，擐甲操演。凡鹿角(hiyahan)、長槍、鳥槍、神威礮、子母礮、蒙古畫角(gocingga buren)、海螺、旗纛等，各飭所司修整。其列陣之法，以八旗左、右兩翼，各按旗為隊，依次排列，每次動員近二萬一千人。¹⁴²與戰爭相關的出征、凱旋之禮，有親征和命將之分，其儀注與康熙朝略同，乾隆朝《大清會典》對「親征之禮」祭堂子的記載，較前為詳，其程序為：

一、預備，在堂子街門外西嚮，設御營、黃龍大纛；於堂子內門外，設八旗護軍纛八於黃龍大纛後，均北嚮。預設皇帝拜位，於圓殿(亭式殿)外甬

¹³⁹ (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唐)陸明德音義，《尚書注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第54冊，卷2，〈舜典〉，「孔穎達疏」，頁7b。「類祭」滿文作「dursulen i wecen」，即「cooha tucire baita bifi(有出兵之事)dergi abkai han de wecerengge(祭上帝者)」。見(清)傅恆等奉敕撰，《御製增訂清文鑑》，卷6，〈禮部·祭祀類·類祭〉，頁41a。

¹⁴⁰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唐)陸明德音義，《禮記注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第115-116冊，卷12，〈王制〉，「孔穎達疏」，頁5a。「禡祭」滿文作「turun i wecen」，即「cooha tucire jalin tangse de turun wecerengge(因出兵在堂子祭纛)」。見(清)傅恆等奉敕撰，《御製增訂清文鑑》，卷6，〈禮部·祭祀類·禡祭〉，頁41b。

¹⁴¹ 清朝的軍禮，有大閱、出征、凱旋，具有文與武、內亞元素與中國元素的交互作用，且有場面壯大的表演與細緻的文本規定，以及豐富的視覺材料。參見衛周安(Joanna Waley-Cohen)著，董建中等譯，《清代戰爭文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0)，頁97-116。

¹⁴² (清)允禩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乾隆朝)》，卷61，〈兵部·武選清吏司·大閱〉，頁4a-5a。「鹿角」(hiyahan)，指在圓木上將許多椽子做成交錯穿插以遮蔽、瞭望者。見(清)傅恆等撰，《御製增訂清文鑑》，卷8，〈武功部·兵類〉，頁4b；(清)傅恆等撰，《御製增訂清文鑑》，卷9，〈武功部·軍器類〉，頁42b。又「蒙古角」(monggo buren)，中央用木，兩端用銅，像喇叭一樣，做成非常長；「畫角」(gocingga buren)，指木製筒形，長五尺餘，中腰微粗，以漆畫，口邊安哨子吹者。分見(清)傅恆等撰，《御製增訂清文鑑》，卷7，〈樂部·樂器類·蒙古角〉，頁17a；(清)傅恆等撰，《御製增訂清文鑑》，卷7，〈樂部·樂器類·畫角〉，頁17a。

道正中及大纛前；從征王公、將士和不從征王公、滿一品官，咸至街門內東面。

二、起駕，皇帝御征衣、佩刀，出宮乘騎，前引後扈，如常儀；至長安橋，八旗鳴角軍鳴角、護軍吹螺，駕入堂子街門，螺、角止。

三、就位，皇帝由禮部堂官二人恭導，由內門、中門入，就圓殿外拜為南嚮立。鴻臚官尹王公於丹陛上，眾官於丹陛下，序立。

四、行禮，鳴贊官奏跪典，皇帝率群臣行三跪九拜禮，畢，恭導黃的就大纛前拜位，南嚮立；王公百官咸就拜位，皇帝率從征將士及群臣行三跪九拜禮。

五、禮成，螺、角齊鳴，禮部尚書跪奏禮成。

六、啟行，皇帝屬囊韃乘騎導迎，樂作，奏《祐平之章》，內大臣、侍衛率親軍舉黃龍大纛隨行。駕由都門出，八旗官軍分翼陳列郭外，皇帝出郭，三舉礮，官軍皆馬上俯伏候駕過，不從征之王公、百官於郊外跪送。¹⁴³

六軍凱旋時，鑾儀衛陳列法駕、鹵簿，自郊外五里設至堂子街門外，在京王公以下、有頂帶官以上，咸出郭五里跪迎，皇帝詣堂子，率從征、不從征王公一品官於圓殿行三跪九拜禮，還宮。與以往不同者，儀注增加「致祭嶽鎮、海瀆、前代帝王陵寢、先師闕里，迺告成太學，勒石紀功，以《平定方略》宣付史館」。¹⁴⁴

至於命將出征，皇帝率大將軍詣堂子行禮，拜纛；大軍凱旋時，亦「勒碑太學，命儒臣輯《平定方略》」。¹⁴⁵然而，乾隆皇帝下令《會典》增補凱旋祭堂子儀注，只限於皇帝親征；命將出征凱旋者，則因乾隆十七年「堂子祀典載入內務府《會典》」的上諭，僅見於《會典則例·內務府》，略為：皇帝展拜於堂子，令欽天監擇吉，皇帝進堂子，就拜位，凱旋將帥、大臣等

¹⁴³ (清)允禔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乾隆朝)》，卷 35，〈禮部·儀制清吏司·軍禮·親征之禮〉，頁 2a-4a。

¹⁴⁴ (清)允禔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乾隆朝)》，卷 35，〈禮部·儀制清吏司·軍禮·親征之禮〉，頁 4a-5b。

¹⁴⁵ (清)允禔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乾隆朝)》，卷 35，〈禮部·儀制清吏司·軍禮·命將之禮〉，頁 7a-8b。

皆依次序立，鳴贊官奏跪拜，興，皇帝行三跪九拜禮，凱旋將帥等均隨行禮，畢，奏禮成，皇帝出至內門外，乘輿還宮。¹⁴⁶

清朝有關出征、凱旋的祭祀，除滿洲傳統的祭堂子之外，陸續加入祭告天、地、宗廟、社稷的漢式儀式，以及謁文廟、立碑、修《方略》等文治元素。乾隆皇帝將戰爭祭祀編製成完整的禮儀制度，惟所增列的「親征」之禮，從未實施；其「命將」之禮，實際執行情形，茲以「十全武功」為例，¹⁴⁷表列如下：

表 3：乾隆朝「十全武功」舉行出征、凱旋儀式一覽表

出征、凱旋 時間、戰役		出征	凱旋				備註
		祭堂子	祭堂子	謁文廟	勒石碑	編方略	
乾 隆 12-14	金川	V		V	V	V	1.乾隆 14 始定凱旋禮 2.勒石：〈平定金川告成太學碑〉 3.編書：《平定金川方略》
乾 隆 19-22	準噶爾	V	V	V	V	V	1.乾隆 19-20、乾隆 22， 兩次征討準噶爾 2.勒石：〈平定準噶爾告成太學碑〉，〈平定準噶爾勒銘伊犁之碑〉、〈平定準噶爾勒銘格登山之

¹⁴⁶ 參見(清)允禔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則例》，卷 161，〈內務府・出師展拜〉，頁 54a-55b。

¹⁴⁷ 所謂「十全武功」，係乾隆皇帝在第二次廓爾喀之役前線告捷，特將「平準噶爾為二，定回部為一，掃金川為二，靖臺灣為一，降緬甸、安南各一，即今二次受廓爾喀降，合為十」；其性質各自不同，對準噶爾、回部，是開疆闢土；對金川、臺灣，為救平邊亂；對緬甸、安南、廓爾喀則屬用兵鄰國。見(清)慶桂等奉敕修，《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十五)》，卷 1414，「乾隆五十七年十月戊辰」條，頁 10a。另參見莊吉發，《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2)，頁 1-7。

							碑〉、〈平定準噶爾後勒銘伊犁之碑〉 3.編書：《平定準噶爾方略》
乾 隆 23-24	回部	V	V	V	V	V	1.勒石：〈平定回部告成太學碑〉，勒銘〈葉爾奇木之碑〉、〈伊西洱庫爾淖兒之碑〉 2.編書：戰事始末附入《平定準噶爾方略》
乾 隆 31-34	緬甸						
乾 隆 36-41	兩金川	V	V	V	V	V	1.勒石：〈平定兩金川告成太學碑〉，〈平定兩金川勒銘美勒之碑〉、〈平定兩金川勒銘烏圍之碑〉、〈平定兩金川勒銘噶拉依之碑〉 2.編書：《平定兩金川方略》
乾 隆 51-52	臺灣			V	V	V	1.在熱河謁文廟 2.勒石〈平定臺灣告成熱河文廟碑〉 3.編書：《平定台灣紀略》
乾 隆 53-54	安南					V	編書：《安南紀略》
乾 隆 53-54	廓爾喀					V	編書：《巴布勒紀略》

乾 隆 56-57	廓爾喀					V	編書：《廓爾喀紀略》
--------------	-----	--	--	--	--	---	------------

資料來源：(清)嵇璜等奉敕撰，《欽定皇朝文獻通考》，卷 99，頁 8b-9a；(清)清高宗御製，于敏中等奉敕編，《御製文集·初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第 1301 冊，卷 17，頁 12b-16a；(清)清高宗御製，于敏中等奉敕編，《御製文集·初集》，卷 19，頁 1a-9a；(清)清高宗御製，于敏中等奉敕編，《御製文集·初集》，卷 20，頁 3a-4a；(清)清高宗御製，于敏中等奉敕編，《御製文集·二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第 1301 冊，卷 28，頁 1a-10a；(清)清高宗御製，于敏中等奉敕編，《御製文集·二集》，卷 29，頁 1a-6b；(清)清高宗御製，于敏中等奉敕編，《御製文集·三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第 1301 冊，卷 11，頁 6b-12a；(清)慶桂等奉敕修，《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十五)》，卷 1477，頁 8a。

諸役中，掃金川、平準噶爾、定回部均有祭堂子，原因當為中央直接命將出征，¹⁴⁸凱旋亦有舉行謁文廟、勒石碑、編方略等儀式；其餘則先由邊臣、疆吏應戰，中央另派員支援，故有差別。其次，緬甸之役被列為重大戰爭，應與乾隆五十三年以後，其國王「謝罪稱臣」，¹⁴⁹並接受清朝冊封有關，而當年實際的戰況卻是邊臣冒進喜功，乾隆皇帝也誤判緬甸易取，以致四次出征，損兵折將，毫無成果，¹⁵⁰是以沒有任何慶祝或紀念的活動，即便當時方略館已將處理緬甸事務始末逐日抄繕成《緬檔》，¹⁵¹仍未編《方略》。至於因天地會林爽文(1756-1788)、莊大田(1734-1788)起事的臺灣之役，乾隆皇帝視之為「內地奸民滋事，非從前平定準噶爾、回部、金川可比」，¹⁵²然以臺灣

¹⁴⁸ (清)嵇璜等奉敕撰，《欽定皇朝文獻通考》，卷 99，〈郊社考·堂子〉，頁 8b-9a。

¹⁴⁹ (清)慶桂等奉敕修，《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十七)》，卷 1307，「乾隆五十三年六月乙卯」條，頁 28b。

¹⁵⁰ 關於戰爭始末，參見莊吉發，《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頁 277-324。

¹⁵¹ 參見莊吉發，《故宮檔案述要》(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3)，頁 237-240。乾隆皇帝御製詩文多次述及此役，更有〈緬甸詩六十韻〉記其事。見(清)清高宗御製，蔣溥等奉敕編，《御製詩集·三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第 1307-1308 冊，卷 66，〈古今體一百二十三首·緬甸詩六十韻〉，頁 6b-9a。

¹⁵² (清)清高宗敕撰，《欽定平定臺灣紀略》，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第 363 冊，卷 58，頁 12b。

「孤懸海外，事經一年」，也不宜與誅王倫(?-1774)、翦蘇四十三(1729-1781)、洗田五(?-1784)等民變相提並論，¹⁵³加以戰事自爆發以迄結束，乾隆皇帝常在避暑山莊運籌帷幄，有感於「籌於斯，發於斯，臻於斯」，¹⁵⁴故而在熱河謁文廟、勒石碑，亦見禮儀制度彈性的一面。

五、結論

清朝皇帝主持的薩滿祭祀，就性質而言，可分為國家祀典和皇室祭禮兩部分，分別在堂子和關外時期的清寧宮、入關後的坤寧宮舉行。北京城堂子按盛京的形式興建，由饗殿、亭式殿、尚錫神亭三幢主要建築，以及周邊的收貯所掛神幡紙錢室、以財物獻神祭祀室、神廚等共同組成；主建物內的陳設、使用的祭器，無論是材質、形制或數量，仍維持簡樸的部落傳統。盛京城的堂子，在入關後日漸荒廢，直到乾隆四十八年乾隆皇帝擬在東巡時舉行秋季立杆大祭，始展開新建工程，但只有饗殿、亭式殿，而無尚錫神亭。

堂子立杆大祭，每年於春、秋兩季舉行，屬於歲時祭祀。據《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所載，這類祭祀尚有元旦、每月初一日(正月為初三日)、浴佛、祭馬神等。就現存關外時期的滿文檔案所見，天命七年元旦，努爾哈齊率八旗諸貝勒、大臣謁堂子，並舉行一連串的慶賀活動，是最早的元旦堂子祭儀；天聰元年元旦，皇太極率眾大臣在堂子祭天，並行三跪九拜之禮，則是在謁堂子活動中，加入「祭天」元素。隨著金國的汗權朝向皇權發展，元旦堂子行禮的儀式日趨繁複，主要有：一、增加清寧宮的行程，使外朝與內廷產生連結；二、仿漢制建太廟，並將太廟祭祖的儀式嵌入元旦堂子行禮的流程，使滿洲傳統與漢式禮儀並存，既能保持滿洲中心的文化自主意識，又可藉由漢族帝王的儀式凸顯統治者的威儀。

¹⁵³ 乾隆三十九年(1774)，清水教教首王倫在山東壽張起事，進佔臨清城；乾隆四十六年(1781)，回民蘇四十三在甘肅河州起事，並圍攻蘭州城；乾隆四十九年(1784)，回民田五率眾在甘肅石峰堡起事，分別編有《臨清紀略》、《蘭州紀略》、《石峰堡紀略》。

¹⁵⁴ (清)清高宗御製，于敏中等奉敕編，《御製文集·三集》，卷11，〈碑文·平定臺灣告成熱河文廟碑文〉，頁6b-7b。

雖然在皇太極時代在家、國體制上已有內與外、私與公之分，但堂子祭祀在國家禮儀制度中，尚未取得明確定位。順治初年，議定皇帝元旦在堂子行禮由禮部預期題請，始確定其屬於國家祀典的地位，也將「孝治天下」的政治理念融入儀式的程序。迨乾隆朝修《會典》，乾隆皇帝指示將堂子祭祀載入內務府項下，惟皇帝元旦詣堂子的預期請旨、奏報儀注，以及流程執行等，皆由禮部統籌辦理，仍屬國家祀典的一部分，且係由奉先殿和太廟祀祖、堂子祭天、清寧宮拜神共同組成，成為唯一與薩滿信仰連結的歲時國家祀典。然而，並非有外朝禮部參與的薩滿祭祀，都可列為國家祀典。例如：乾隆十一年(1746)奉旨：「嗣後春、秋立杆致祭，親詣堂子行禮儀注，著禮部會同內務府同奏」，¹⁵⁵由於事關皇帝「親詣」的禮儀問題，交由禮部、內務府共同辦理，但僅限於儀注部分，故立杆大祭的皇室祀典性質未變。¹⁵⁶

在堂子舉行的國家祀典，另有出征、凱旋的戰爭祭祀，大約是由部落祭纛、拜天的傳統發展而來，但直到天命十年始見諸滿文檔案記載，在皇太極時代則形成一套複雜的禮儀程序。順治八年，制定祭祀群臣扈從、接送駕儀注，出征祭堂子正式成為國家的祀典，並與漢式祭告天、地、太廟、社稷的典禮相結合；惟這套被稱為「命將出征儀」的儀式，在順治至康熙朝初期時舉時停。直到康熙三十五年，因康熙皇帝御駕親征準噶爾而盛大辦理，凱旋時又增加昭告文廟、勒石太學等「文治」元素，並成為慣例。降及乾隆朝初

¹⁵⁵ (清)允禩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則例》，卷 161，〈內務府掌儀司·春秋二季立杆致祭〉，頁 44b。《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內有立杆大祭儀注，《內閣大庫檔》現存與之相關的檔案只有〈移會〉一件，曰：「堂子立杆大祭，皇上親詣行禮儀注內，一品滿大臣穿蟒袍補服隨往堂子行禮時，排立不隨行禮。」分見(清)允祿等奉敕撰，阿桂、于敏中等譯漢，《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卷 3，〈堂子立杆大祭儀注〉，頁 18b-25b；〈禮部·移會內閣典籍廳為九月初一日堂子立杆大祀皇上親詣行禮儀注內一品滿大臣穿蟒袍補服隨往今定於本月二十九日午時在堂子演禮〉，「乾隆十三年八月二十八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內閣大庫檔案資料庫》，登錄號：106770。

¹⁵⁶ 道光二十五年(1845)，內務府奏為「改用印信章程，以符體制，而便稽察」事，曰：「每年春、秋二季，堂子豎杆大祭祭祀等事，行禮部祠祭司、儀制司、精膳司、主客司，由該司辦理，牌票鈐用堂印」，仍是由內務府與禮部共同辦理。見〈宮中改革體制案〉，收入經莉編，《清內務府檔案文獻匯編》(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4)第 1 冊，頁 33、40-41。

期，再據康熙皇帝親征的儀式，制定「親征之禮」，並將編修方略納入凱旋儀式的一部分。

戰爭是國家大事，代表滿洲傳統祭堂子儀式的重要意義不言可喻，國家重大戰爭都是以八旗勁旅為主，故有統合八旗與國家的象徵意義。雖然「文治」的內容也成為戰爭儀式的一部分，但是乾隆皇帝始終堅持滿洲傳統與軍事價值，〈御製十全記〉曰：「迺知守中國者，不可徒言偃武修文，以自示弱也」，¹⁵⁷則見凱旋告至堂子的必要性。影響所及，禮親王昭槤(1766-1829)宣稱：出師展拜堂子、凱旋詣行告成禮，「均與古之禡禡告功明堂之禮相同。實國家祈禱之虔，百神之所佑庇，與商、周之制若合符節，所以綿億萬載之基也」。¹⁵⁸總之，無論是元旦堂子行禮，或是出征、凱旋祭堂子，都是陸續加入新元素，使儀式的內容更為豐富、多元，但官方卻不斷強調是恢復「傳統」，並回溯至太祖時期。

¹⁵⁷ (清)清高宗御製，于敏中等奉敕編，《御製文集·三集》，卷8，〈記·十全記〉，頁12a。

¹⁵⁸ (清)昭槤，《嘯亭雜錄》，卷8，〈堂子〉，頁232。

徵引書目

Bibliography

(一) 檔案資料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註，《滿文老檔》，北京：中華書局，1990。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摺》，北京：中華書局，1996。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帝起居注》，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整理，《康熙起居注》，北京：中華書局，1984。

《內閣大庫檔案資料庫》，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庫勒納等奉敕撰，《清代起居注·康熙朝》，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9。

馮明珠主編，《滿文原檔》，臺北：沉香亭企業社，2006。

《清代檔案檢索系統》，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經莉編，《清內務府檔案文獻匯編》，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4。

楊豐陌、趙煥林、佟悅主編，《盛京皇宮和關外三陵檔案》，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3。

滿文老檔研究會譯註，《滿文老檔》，東京：東洋文庫，1959-1963。

遼寧省檔案館編，《黑圖檔·乾隆朝》，北京：線裝書局，2015。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檔案》，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

(二) 官書典籍

(周)左丘明撰，(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唐)陸德明音義，《春秋左傳注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43-144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唐)陸明德音義，《尚書注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4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唐)陸明德音義，《禮記注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5-116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唐)陸明德音義，《周禮注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9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明)申時行等修，《明會典》(萬曆朝重修本)，北京：中華書局，1989。
- (清)剛林等修，《*daicing gurun i taidzung genggiyen šu hūwangdi i yargiyan kooli*(大清太宗文皇帝實錄)》，初纂滿文本，マイクロフィルム資料，東京：東洋文庫東北アジア研究班藏。
- (清)剛林等修，《大清太宗文皇帝實錄》，初纂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清)伊桑阿等纂修，《大清會典(康熙朝)》，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 72-73 輯第 711-730 冊，臺北：文海出版社，1992。
- (清)清聖祖御製，張玉書等奉敕編，《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98-1299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清)馬齊等修，《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
- (清)允祿等監修，《大清會典(雍正朝)》，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 77-79 輯第 761-790 冊，臺北：文海出版社，1995。
- (清)鄂爾泰等修，《*daicing gurun i šidzu eldembuhe hūwangdi i yargiyan kooli*(大清世祖章皇帝實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清)鄂爾泰等修，《清實錄·太宗文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
- (清)鄂爾泰等修，《清實錄·世祖章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
- (清)鄂爾泰等修，《八旗通志·初集》，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85。
- (清)張廷玉等修，《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

- (清)允祿等奉敕撰，《*hesei toktobuha manjusai wecere metere kooli bithe*(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清乾隆十二年(1747)刻本，東京：東洋文庫藏。
- (清)允祿等奉敕撰，福隆安等奉敕校勘，《皇朝禮器圖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56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清)允禔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乾隆朝)》，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19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清)允禔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則例》，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20-625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清)傅恆等奉敕撰，《御製增訂清文鑑》，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32-23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清)允祿等奉敕撰，阿桂、于敏中等譯漢，《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57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清)來保等奉敕撰，《平定金川方略》，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356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清)阿桂、于敏中等奉敕撰，《欽定滿洲源流考》，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499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清)阿桂等奉敕撰，《欽定盛京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01-50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清)和珅等奉敕撰，《大清一統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474-48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清)嵇璜等奉敕撰，《欽定皇朝文獻通考》，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32-638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清)嵇璜等奉敕撰，《欽定皇朝通典》，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42-64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清)清高宗御製，于敏中等奉敕編，《御製文集·初集、二集、三集、餘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01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清)清高宗御製，蔣溥等奉敕編，《御製詩集·三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07-1308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清)清高宗敕撰，《欽定平定臺灣紀略》，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36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清)紀昀、陸錫熊、孫士毅等奉敕撰，《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5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清)慶桂等奉敕修，《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
- (清)托津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嘉慶朝)》，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 64 輯第 631-640 冊，臺北：文海出版社，1991。
- (清)世續等修《清實錄·德宗景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7。
- (清)談遷，《北游錄》，北京：中華書局，1960。
- (清)沈啟亮輯，《大清全書》，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8。
- (清)楊賓，《柳邊紀略》，北京：中華書局，1985。
- (清)昭槤，《嘯亭雜錄》，北京：中華書局，1980。
- (清)福格，《聽雨叢談》，北京：中華書局，1984。
- (清)吳振棫，《養古齋叢錄》，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
- (清)吳慶坻，《蕉廊脞錄》，北京：中華書局，1990。
- (清)祥亨主編，志寬、培寬編，《清文總彙》，據清光緒二十三年(1897)荊州駐防繙譯總學藏板，臺北：中國邊疆歷史語文學會，無出版年。
- (清)震鈞，《天咫偶聞》，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 22 輯第 219 冊，臺北：文海出版社，1968。
- 信修明遺著，亞倫整理，《老太監的回憶》，北京：燕山出版社，1987。

(三)專書著作

佟悅，《清代盛京城》，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9。

侯之仁主編，《北京歷史地圖集·政區城市卷》，北京：北京出版集團公司，2013。

莊吉發，《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2。

莊吉發，《故宮檔案述要》，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3。

莊吉發，《薩滿信仰的歷史考察》，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6。

張晉藩、郭成康，《清入關前國家法律制度史》，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8。

富育光、孟慧英，《滿族薩滿教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

葉高樹，《滿文《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譯註》，臺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2018。

衛周安(Joanna Waley-Cohen)著，董建中等譯，《清代戰爭文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0。

羅友枝(Evelyn S. Rawski)著，周衛平譯，《清代宮廷社會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

(四)期刊論文

白洪希，〈清宮堂子祭探蹟〉，《滿族研究》，1995年第3期(瀋陽，1995.08)，頁61-63。

白洪希，〈清宮堂子祭祀研究〉，《民族研究》，1996年第4期(北京，1996.07)，頁78-83。

白洪希，〈盛京清寧宮薩滿祭祀考辨〉，《故宮博物院院刊》，1997年第2期(北京，1997.05)，頁31-36。

石橋崇雄，〈清初祭天儀禮考〉，收入石橋秀雄編，《清代中国の諸問題》，東京：山川出版社，1995，頁57-92。

- 吳恩榮，〈國家禮制視域下的清代滿州祭禮之源起與流變〉，《清史研究》，2019 年第 3 期(北京，2019.08)，頁 66-76。
- 杜家驥，〈從清代的宮中祭祀和堂子祭祀看薩滿教〉，《清史研究》，1990 年第 1 期(北京，1990.02)，頁 45-49。
- 孟森，〈清代堂子所祀鄧將軍考〉，收入孟森，《明清史論著集刊》，北京：中華書局，1959，頁 311-323。
- 姜小莉，〈清入關前滿族薩滿教變革論析〉，《黑龍江民族叢刊》，2008 年第 2 期(哈爾濱，2008.03)，頁 107-111。
- 姜小莉，〈薩滿教與清代國家祭祀〉，《社會科學戰線》，2019 年第 3 期(長春，2019.03)，頁 131-139。
- 姜相順，〈清宮薩滿祭祀及其歷史演變〉，《清史研究》，1994 年第 1 期(北京，1994.02)，頁 71-78。
- 陶立璠，〈清代宮廷的薩滿祭祀〉，《西北民族研究》，1992 年第 1 期(蘭州，1992.02)，頁 221-232。
- 楠木賢道，〈清太宗皇太極的太廟儀式和堂子——關於滿漢兩種儀式的共處情況〉，《清史研究》，2011 年第 1 期(北京，2011.02)，頁 124-129。
- 葉高樹，〈《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編譯、版本極其史料價值〉，收入葉高樹，《滿文《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譯註》，臺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2018，頁 15-38。
- 葛兆光，〈堂子或祀鄧將軍？正月初一所見之大清宮廷秘事〉，收入葛兆光，《想像異域：讀李朝朝鮮漢文燕行文獻札記》，北京：中華書局，2014，頁 165-178。
- 劉厚生，〈一部鮮為人知的薩滿教典籍——《滿洲跳還願典例》評介〉，收入閻崇年編，《滿學研究·第一輯》，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頁 173-179。
- 劉厚生、陳思玲，〈《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評析〉，《清史研究》，1994 年第 1 期(北京，1994.02)，頁 66-70。

鄧小南，〈走向「活」的制度史——以宋代官僚政治制度為例的點滴思考〉，《浙江學刊》，2003 年第 3 期(杭州，2003.03)，頁 99-103。

鄭天挺，〈滿洲入關前後幾種禮俗之變遷〉，收入鄭天挺，《清史探微》，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頁 32-54。

賴惠敏，〈清乾隆皇帝製作金屬祭器的意義〉，《故宮學術季刊》，37 卷 3 期(臺北，2020.09)，頁 45-94。

閻崇年，〈清代宮廷與薩滿文化〉，《故宮博物院院刊》，1993 年第 3 期(北京，1993.07)，頁 55-64。

附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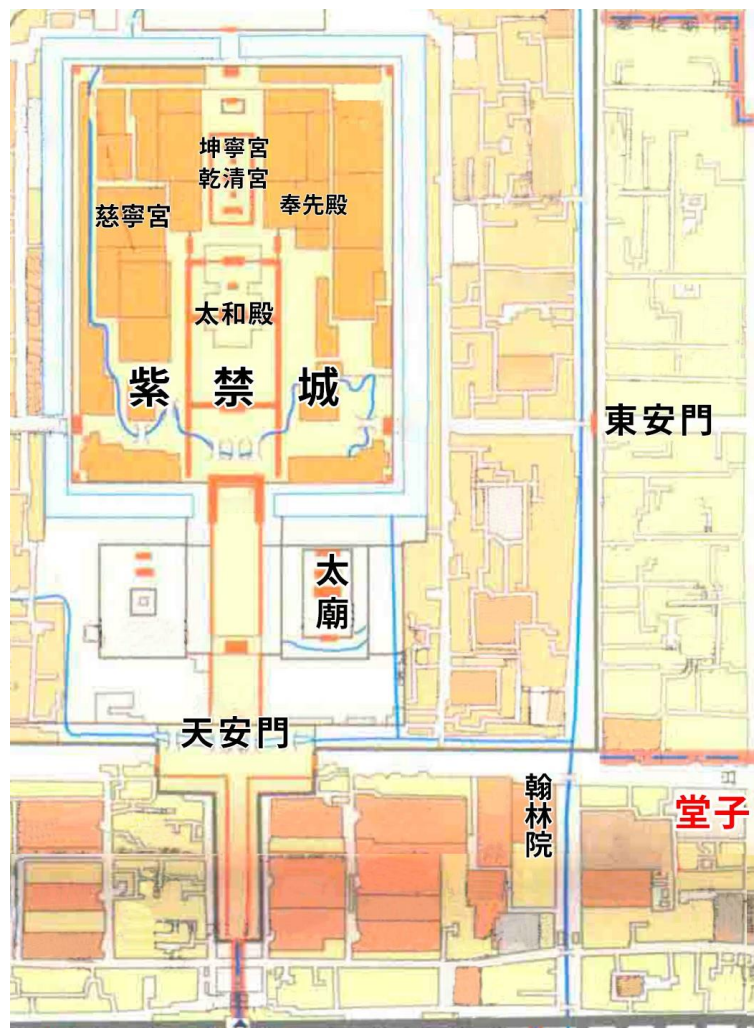


圖 1：北京城堂子位置圖

資料來源：〈清北京城(一)·乾隆十五年(1750)〉，收入侯之仁主編，《北京歷史地圖集·政區城市卷》(北京：北京出版集團公司，2013)，頁 90-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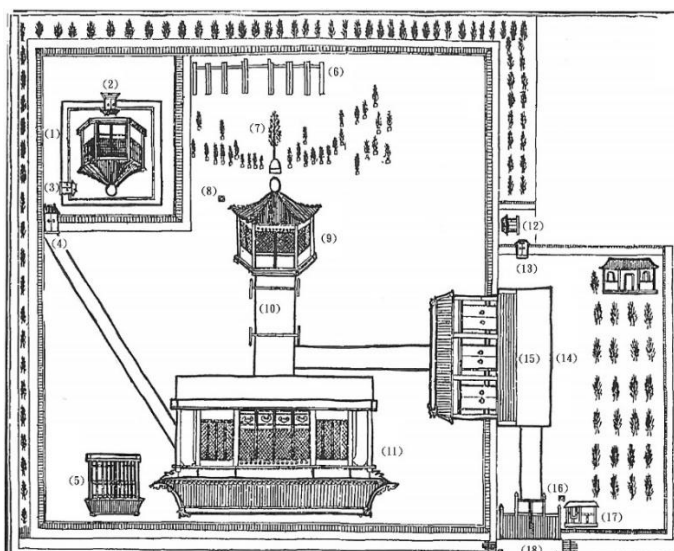


圖 2：tangse i nirugan(堂子圖)

說明：

- (1)šangsi enduri ordo：尚錫神亭
- (2)、(3)、(4)、(13)、(15)duka：門
- (5)lakiyaha girdan hoošan jiha be asarara boo：收貯所掛神幡紙錢室
- (6)siltan moo be sindara tehe：立神杆架
- (7)siltan moo：神杆
- (8)hūcin：井
- (9)ordo：亭式殿
- (10)siren futa alire tehe：安線索架
- (11)wecere deyen：饗殿
- (12)horho boo：淨室(廁所)
- (14)gidaha ulin baita de teisulefi fayabume wecere boo：以財物獻神祭祀室
- (16)hūcin：井
- (17)juce i boo：堆撥房(軍隊輪班坐更處)
- (18)hiyatari：柵欄

資料來源：

(清)允祿等奉敕撰，《hesei toktobuha manjusai wecere metere kooli bithe(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第 6 冊，頁 2a-2b。葉高樹，《滿文《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譯註》，頁 432-4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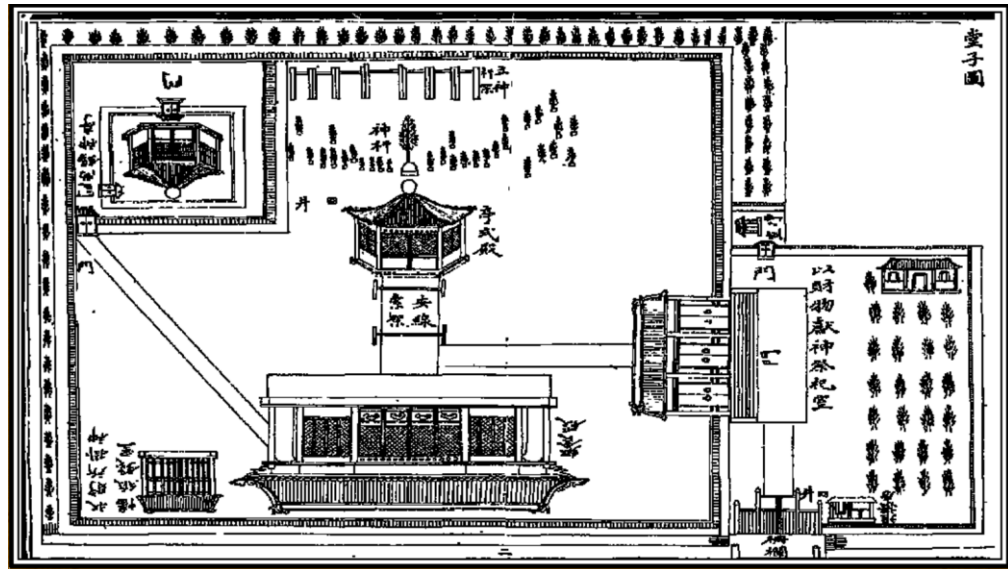


圖 3：堂子圖

資料來源：(清)允祿等奉敕撰，阿桂、于敏中等譯漢，《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57 冊，卷 6，頁 2a-2b。



圖 4：清末北京城新建堂子位置圖

資料來源：〈清北京城(二)·宣統年間年(1909-1911)〉，收入侯之仁主編，《北京歷史地圖集·政區城市卷》，頁 90-91。



圖 5：盛京堂子圖

資料來源：佟悅，《清代盛京城》，頁 1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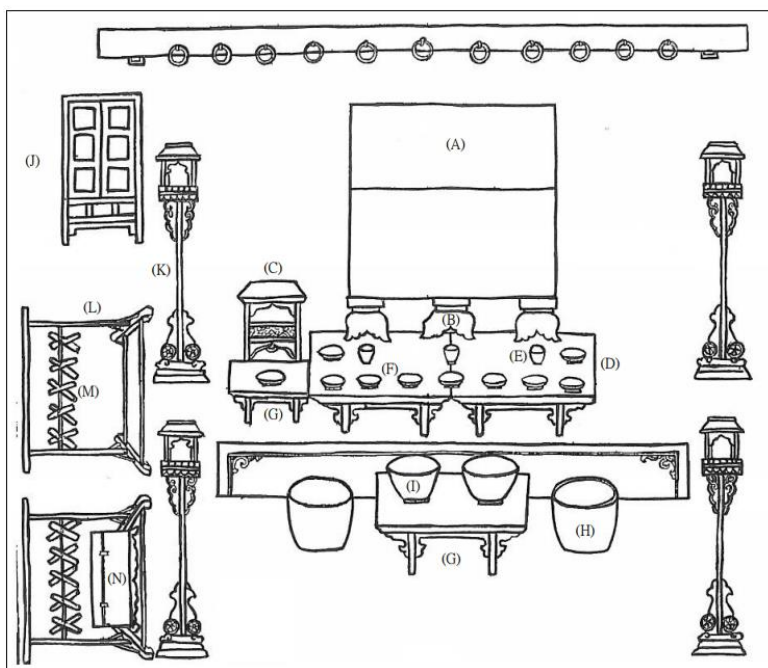


圖 6：饗殿內陳設祭器

說明：

- (A)鑲紅片金黃緞神幔(1)
- (B)銅香碟(3)
- (C)安放供金佛亭紅漆座(1)
- (D)黃漆大低桌(2)
- (E)供酒銀琖(3)
- (F)供饌銀盤(10)
- (G)獻酒楠木低桌(2)
- (H)盛酒紅花磁缸(2)
- (I)盛酒大藍花磁碗(2)
- (J)盛器皿黑漆豎櫃(1)
- (K)黃紗蟲鐙(4)
- (L)掛拍板紅漆木架(2)
- (M)花梨木拍板(10)
- (N)盛拜褥紅漆箱(1)

資料來源：(清)允祿等奉敕撰，阿桂、于敏中等譯漢，《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卷 6，頁 4a-4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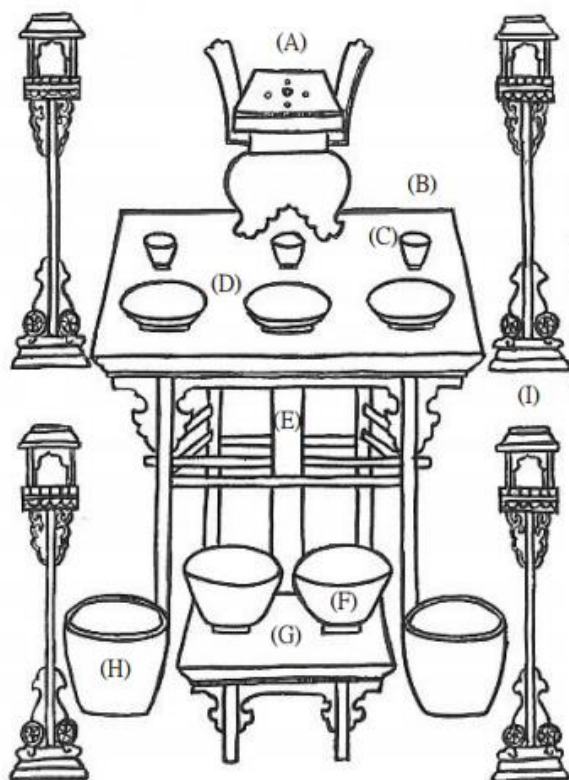


圖 7：亭式殿內陳設祭器

說明：

- (A)銅香爐(1)
- (B)楠木高案(1)
- (C)供酒銀琖(3)
- (D)供饌銀盤(3)
- (E)案下設掛紙錢杉木柱(1)
- (F)盛酒大藍花磁碗(2)
- (G)獻酒楠木低桌(1)
- (H)盛酒暗龍豆綠磁缸(2)
- (I)黃紗蟲鏝(4)

資料來源：(清)允祿等奉敕撰，阿桂、于敏中等譯漢，《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卷 6，頁 5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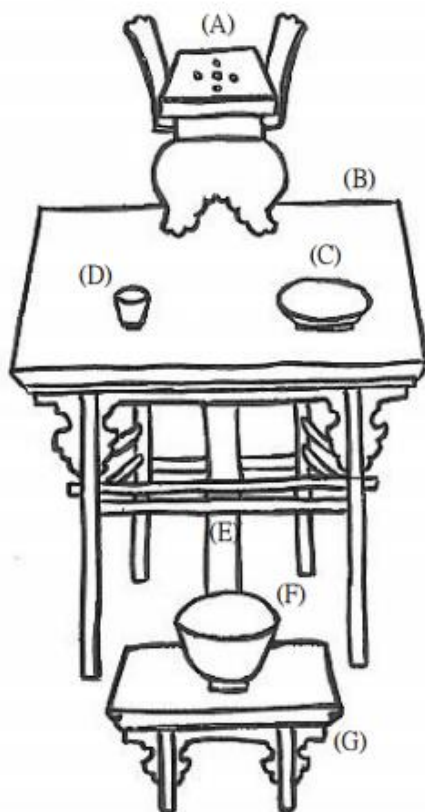


圖 8：尚錫神亭內陳設祭器

說明：

(A)銅香爐(1)

(B)楠木高案(1)

(C)供饌銀盤(1)

(D)供酒銀琖(1)

(E)案下設掛紙錢杉木柱(1)

(F)盛酒大藍花磁碗(1)

(G)獻酒楠木低桌(1)

資料來源：(清)允祿等奉敕撰，阿桂、于敏中等譯漢，《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卷 6，頁 6b。

Tangse and the National Ritual System in the Qing Dynasty

Yeh, Kao-shu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he Tangse rituals of the Qing Dynasty, which originated from Shamanism of the Jurchen people, gradually became more complex as the regime developed, and combined with the ceremonies inherited from the Ming Dynasty, became part of the state's sacrificial rituals. 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the *Manzhou Jishen Jitian Dianli* is a ritual book belonging to Shamanism of the Qing imperial family, and most of the existing studies also categorize the Tangse rituals as palace activities. In fact, both the regular annual rituals starting with New Year's Day and the military ceremonies held in connection with expeditions and triumphs were closely integrated with the national ceremonial system. Although the Qing emperors repeatedly emphasized that Tangse rituals were a Manchurian tradition, they were in fact part of a process of ritual institution-building. Therefor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history of Tangse as a part of the national ritual system in terms of the changes in its sacrificial rituals and its interface with the Han rituals, in order to presen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the Qing Dynasty.

Keywords: Tangse, Shamanism, Manchu traditions, *Manzhou Jishen Jitian Dianli*

